

资讯信息 仅供参考

高教决策参考



2025 | 22

第2卷第22期

总第33期

上海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目录

高教动态 1

落实《未来契约》大学对话活动在京举办 《大学实施〈未来契约〉行动计划》发布	1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管理分会“大学治理改革与教育强国建设”学术研讨会举办	2
首届数字人文国际会议在郑州大学举行	3
广东省高等教育学会 40 周年发展大会在广州召开	3
广东省数智化赋能高校教师创新发展研讨会召开	5
国际动态 世界大学校长联合会举行会议 探讨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创新	6
国际动态 芬兰推出高等教育学生国际流动与竞争力提升新举措	7
国际动态 美国公众对高等教育的信任度持续下滑	9
国际动态 美国发布大学生健康心智研究全国报告 17%的大学生经历“严重抑郁症”	10
院校动态 第四届清华高等教育论坛举行	12
院校动态 首届稷下教育论坛暨《山东大学教育评论》创刊号发布活动在山东大学举行	13
院校动态 西北师范大学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新模式——“温暖陪伴”护航学生成长	13

高教研究 16

我国高等教育专业设置及调整历史脉络、底层逻辑与高校应对 施晓光	16
高等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加快地方高水平大学发展的战略价值、现实挑战与实践对策 蔡荣根 伍宸	24
教育对外开放的新使命新作为新成效 王定华 涂端午	29
学分“减”了，人才培养该“加”些什么 王轩尧	38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与大学未来 吉尔斯·卡登 乔什·弗里曼	41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人才培养须适应发展“快节奏” 赵婷婷 燕淑娟	43



高教决策参考

高教决策参考
2025 年第 22 期
第 2 卷第 22 期·总第 33 期
2025 年 10 月 24 日发布

上海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200234 上海市桂林路 100 号
徐汇校区西部计算中心 2 楼
<https://ghc.shnu.edu.cn>

他山之石 45

欧盟推进高校分类发展的新路径及启示 文雯 常伶俐 杨熙	45
人工智能时代国外高校教师专业发展项目实施特征、挑战与启示 段戴平 高思琦 丁林	46
德国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新解——基于工业技术文化的视角 巫锐	46
世界一流高校教育智库的组织模式、运行机制及其启示——以哈佛大学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为例 姜朝晖 兰思亮 李洋	47
数字化转型赋能高等教育：澳大利亚迪肯大学的探索与经验 柴恋琪	47



高教决策参考

高教决策参考
2025 年第 22 期
第 2 卷第 22 期·总第 33 期
2025 年 10 月 24 日发布

上海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200234 上海市桂林路 100 号
徐汇校区西部计算中心 2 楼
<https://ghc.shnu.edu.cn>

高教动态

落实《未来契约》大学对话活动在京举办 《大学实施〈未来契约〉行动计划》发布

10月16日，落实《未来契约》大学对话活动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办。该活动由联合国大学（联合国下设国际性大学）与联合国驻华系统主办，北京外国语大学与南非开普敦大学承办。国内外多所高校学者和青年学生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大学在推动《未来契约》落实、加速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使命和路径。

2024年9月，在联合国未来峰会上，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一致通过《未来契约》及其附件《全球数字契约》和《未来世代宣言》，旨在加速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重振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

联合国政策事务副秘书长盖·莱德在视频致辞中提出：“《未来契约》提出了和平、公平、包容和可持续的未来愿景，而大学与学术界在将言论转化为行动过程中可以发挥关键作用。”

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落实《未来契约》部门主任塞姆巴·卡鲁阿同样认为，大学是连接政策与行动、理想与现实的重要桥梁。他高度评价中国高校在推动多边合作、青年参与和数字治理方面的积极探索，呼吁全球高校共同构建面向未来的知识共同体。

联合国发展系统驻华协调员常启德表示，可持续发展面临地缘冲突、粮食危机、气候变化等严峻挑战，大学在落实《未来契约》中要发挥独特作用，汇聚智慧和专业技能，推动国际合作，为落实《未来契约》注入持续动力。

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王定华、联合国大学日内瓦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亚当·戴、南非开普敦大学副校长莫萨·莫沙贝拉分享各自学校支持《未来契约》的行动愿景，表示将通过深化全球大学合作、鼓励青年参与推动《未来契约》落地。

在“面向未来的大学研究与合作”主旨对话环节，来自上海纽约大学、南非开普敦大学、卡塔尔哈马德·本·哈利法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高校的代表，就人工智能治理、跨学科合作、科研范式变革等议题展开深度交流，分享实践经验和未来设想。

作为此次对话活动的重要成果，会议正式发布《大学实施〈未来契约〉行动计划》。该计划由北京外国语大学牵头，在联合国秘书处指导下，由联合国大学支持，联合南非开普敦大学等多个区域高校共同制定。

该行动计划将围绕“将《未来契约》融入课程与教育、建设可持续校园、数字能力建设与包容、科研创新与知识转化、青年与未来世代参与、国际合作与伙伴关系”六大优先领域展开。计划还提出通过建立“未来大学联盟”、启动“未来学习卓越中心”等机制，推动高校在人才培养、科研合作、政策倡导等方面系统落实《未来契约》。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管理分会“大学治理改革与教育强国建设” 学术研讨会举办

10月16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管理分会学术研讨会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召开。本次研讨会以“大学治理改革与教育强国建设”为主题，汇聚全国高校管理者、专家学者及企业代表，共话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管理分会理事长、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彭实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与会专家围绕主题展开深入探讨。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周海涛提出，学科建设与内部治理创新是高校高质量发展的“双轮驱动”，需强化学校顶层协同与学院中层驱动的联动机制。华东理工大学副校长赵黎明从世界大学发展史出发，强调高校应通过“准确定位”破除同质化困境，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党委书记李乐飞倡导将系统工程方法引入大学治理，提出“SE4Education”与“Education4SE”的融合构想。科大讯飞副总裁陈红斌则展示了人工智能大模型如何赋能高校科研、教学与评价全场景，助力释放教育生产力与想象力。

会议设3个平行分会场，分别聚焦“学科专业建设及其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机制创新”“人工智能与大学内部治理改革”三大议题。来自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管理分会、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厦门大学等单位的20余位代表分享了在专业学位发展、集成电路人才培养、科技成果转化、依法治校智能化等方面的创新实践与深度思考。与会者普遍认为，当前高校治理正面临技术变革与制度转型的双重挑战，唯有坚持系统观念、

强化协同联动、拥抱智能赋能，方能走出一条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新路。

本次会议吸引了来自全国百余所高校的 400 余位领导干部及中青年骨干参加，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高等教育管理者服务教育强国建设的责任担当与创新智慧。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首届数字人文国际会议在郑州大学举行

10 月 10 日至 12 日，首届数字人文国际会议在郑州大学举办。本次会议由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主办，澳门大学人文学院协办。会议以“数字人文驱动的学科融合新视界”为主题，汇聚了来自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法国、比利时、韩国、马来西亚等多国高校，以及国内 90 余所高校与科研院所的 200 余位专家学者，共同探讨数字技术赋能人文社科发展的前沿议题。

郑州大学党常委、副校长王海杰在开幕式上表示，数字技术正深刻重塑人类生活、生产与交往方式，推动知识生产、传播与应用模式发生根本性变革。在此背景下，数字人文作为新文科建设的关键方向，已成为推动人文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数字人文建设必须打破学科壁垒，系统融合计算机、人工智能与数据分析等技术，拓宽研究视野，创新研究方法与范式。

会议期间，25 位国内外知名学者作主旨发言，内容涵盖人工智能与文学创作、语料库语言学与翻译研究、跨语言知识库构建、学术伦理与知识未来等重要方向，具体涉及数字方法在社会文化研究中的创新应用、AI 翻译系统的意识形态倾向分析、人机协同翻译模式探索以及情感计算与文学伦理等前沿议题。

在 13 场平行分论坛上，来自不同机构的专家学者与师生代表围绕数字人文的理论建构、方法创新与未来路径展开深入交流，重点探讨了数字技术在语料构建、数据挖掘、可视化分析与人工智能辅助研究等方面的具体实践。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广东省高等教育学会 40 周年发展大会在广州召开

10 月 18 日，广东省高等教育学会成立 40 周年发展大会在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召开。

大会由 40 周年纪念大会、学术论坛和高等教育成果展等环节组成，吸引了来自省内外学会代表、高校负责人、专家学者及学会理事监事等 500 余人参加。会议由广东省高等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廖益主持。

广东省高等教育学会自 1985 年 11 月成立以来，始终坚守“繁荣高等教育科学，服务全省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初心，与广东高等教育事业同频共振。目前，学会拥有 146 家理事单位、27 家分支机构，已成为推动广东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力量。

40 年来，学会在政策研究、学术交流、成果推广与服务决策等方面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从推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高教体制改革，到聚焦新时代教育强国建设；从连续 20 年搭建海峡两岸（粤台）高教交流平台，到牵头探索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协同路径；从连续举办五届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激发教学活力，到实现分支机构覆盖高教各领域——学会已成为广东高教改革的“思想库”、成果转化的桥梁和人才成长的沃土，有力推动广东省高等教育实现从精英化到普及化的历史性跨越。

广东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朱建华在致辞中介绍，目前广东共有高校 166 所，总量居全国第三。“十四五”以来，全省新增 10 所本科院校（含新建与专升本），新增数量居全国首位，实现 21 个地级市本科、高职院校全覆盖。深圳理工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广州城市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合作）、东莞大湾区大学等一批新型研究型大学实现高起点办学、高标准招生。

广东深入实施高等教育“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提升计划，取得显著成效：8 所高校的 21 个学科入选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名单，30 所高校的 252 个学科进入 ESI 全球排名前 5‰，11 所高校的 37 个学科进入前 1‰，两个学科进入前 1‰，ESI 学科新增数量位居全国前列。据软科报告，广东高等教育整体发展水平位列全国第四，稳居第二梯队。

朱建华在讲话中充分肯定学会对广东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力支撑。他指出，广东正深入贯彻落实《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朝着“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高等教育集群”目标迈进，期待学会在服务决策、引领创新、促进协同上展现新作为。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周玉对学会成立 40 周年表示热烈祝贺，并高度评价学会取得的丰硕成果。他强调，高等教育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关键结合点，必须发挥“龙头”引领作用。希望学会紧密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勇担时代使命，

服务新发展格局；立足广东改革开放前沿，深化理论研究，贡献“广东智慧”；持续创新工作机制，加强自身建设，树立一流学会标杆。

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会长丁晓昌代表兄弟学会致辞，表示将继续与广东学会携手深化跨区域高教协同发展，共同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王兵代表承办单位致辞。他表示，学校的发展得益于学会的引领与赋能，未来将继续与各兄弟院校共同助力教育强国与强省建设，积极拥抱数智教育浪潮，服务广东高质量发展。

广东省高等教育学会会长李大胜在学会工作报告中回顾了40年发展历程，表示学会将坚持学术立会、服务兴会、协同强会、规范治会，在强化政治引领、服务大局、交流合作与内部治理等方面重点发力，为教育强国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

大会发布了《广东高校服务教育强国和强省建设倡议书》，凝聚全省高校行动共识，明确发展方向，并向荣誉顾问颁发证书，对优秀分支机构进行表彰。

会前，与会嘉宾参观了高等教育成果专题展，深入了解了广东高校、科研机构及企业在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科技研发与服务社会等方面的成果。会议期间还举办以“教育强国建设与广东高校使命”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南方医科大学等高校的校长及专家，围绕高校服务国家战略、学科布局、数字化时代人才培养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

（来源：《南方日报》官网）

广东省数智化赋能高校教师创新发展研讨会召开

近日，首届广东省数智化赋能高校教师发展研讨会暨广东省高等教育学会教育技术专业委员会换届大会在华南师范大学举行。会议由广东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及广东省高等教育学会教育技术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华南师范大学教师发展中心承办。

华南师大副校长阳成伟表示，教育强国和高等教育强省建设已驶入“快车道”，数智技术正日益成为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和教师队伍建设的强动能。

广东省高等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廖益对新一届理事会提出三点希望，强化政治引领，坚

持乘势而上，促进协同创新。

广东省委教育工委委员、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李璧亮强调，广东省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全省高校必须勇立潮头并紧密围绕《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八大体系”明确发展目标，聚焦“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要求，以数智化为契机，推动教师发展模式创新。

换届大会环节，广东省高等教育学会教育技术专业委员会第七届理事长谢幼如代表第七届广东省教育技术专业委员会作理事会工作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八届专委会常务理事会，及理事长、副理事长及秘书长等。华南师大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教育人工智能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胡小勇当选为新一届理事长。

学术研讨环节，广东工业大学教授胡钦太、西安交通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主任徐忠锋、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未来教育研究所所长曹培杰、清华大学教育学院人工智能教育研究所所长韩锡斌以及胡小勇等五位专家学者围绕高校教师创新发展与探索等，作主旨报告。

此外，为交流广东高校数智化赋能教师创新发展的优秀经验，会议举办了创新案例圆桌研讨。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国际动态 | 世界大学校长联合会举行会议 探讨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创新

世界大学校长联合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esidents, IAUP）于 10 月 13 日至 15 日在首尔威斯汀朝鲜酒店（The Westin Josun hotel）举行半年度会议，同时隆重庆祝其成立六十周年。此次盛会汇聚了全球各地的大学领导人与教育专家，共同探讨在技术与社会急剧变革背景下的高等教育未来。世界大学校长联合会主席陈肖纯（Shawn Chen）在开幕致辞中强调，该组织六十年来始终致力于促进高等教育领袖间的全球对话，作为一个连接各大洲大学领导层与商业创新者的独特网络，持续推动合作、创新与学术卓越的共同目标。他指出，钻石禧年不仅是对时间的庆祝，更是对联合会通过高等教育连接世界的持久愿景的致敬。

韩国教育部长官崔教珍（Choi Kyo-jin）通过视频发言指出，在人工智能（AI）与数字

创新时代，大学必须超越单纯的知识传授，转向创造新价值，并培养能够应对人类共同挑战的全球人才。他特别提到，韩国正通过教育创新引领这些变革，为后代在快速变化的世界中茁壮成长做好准备。此观点呼应了会议对高校角色多元化的普遍共识。新日教育基金会（Shinil Educational Foundation）理事李相均（Lee Sang-kyun）进一步强调了大学持续努力以适应教育环境快速变化的必要性，他认为世界大学校长联合会的奉献精神确保了此次庆典不仅是回顾过去，更是为剧变时代的高等教育未来点亮灯塔。

本次会议的核心议题聚焦于人工智能与数字化浪潮驱动下高等教育的深刻转型。与会者一致认为，大学需从传统的知识传授机构，转变为能够创造新价值、培养解决复杂全球性问题人才的创新枢纽。同时，会议也揭示了高等教育系统当前面临的多重危机：包括紧迫的财务可持续性问题、大学学位市场价值的相对贬值、外部政治环境的挑战以及劳动力结构性变革对终身学习体系的迫切需求。这些讨论共同勾勒出一幅全球高等教育站在十字路口的图景：它既需拥抱技术革新以履行新时代的使命，也必须直面内部财务与外部的社会政治经济压力，进行根本性的自我重塑以确保其未来的相关性与活力。

会议还讨论了高等教育机构面临的具体挑战与危机。桑坦德集团（Santander Group）墨西哥秘书长阿图罗·切博夫斯基（Arturo Cherbowski）在主题演讲中直言不讳地揭示了全球大学普遍面临的财务困境。他以银行家的身份指出，大学资金严重不足——预算、捐赠模式、学费收入均难以满足需求，且私立院校处境相似。他警告称，大学学位的经济溢价正在显著降低，持有大学学位者相对于无学位者的收入优势较二十年前已大幅缩水。此外，切博夫斯基还指出了来自政治领域和就业市场的额外压力，例如美国民粹主义政府对高等院校的攻击。他强调，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终身教育已成为现实需求，而许多大型跨国公司计划在未来三四年内削减约30%的劳动力，形势严峻。他呼吁大学领导层必须正视这场危机，坦诚交流真相，并彻底转变运营模式。

（来源：韩国时报（The Korea Times）官网）

国际动态 | 芬兰推出高等教育学生国际流动与竞争力提升新举措

芬兰国家教育署（Finnish National Agency for Education）10月20日发布新闻稿，公布旨在提升高等教育学生国际竞争力与流动能力的专项建议。该建议由芬兰教育部和文化部（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牵头的工作组制定，自2024年秋季起，工作组深入分

析欧洲高等教育发展趋势,并从芬兰高等教育机构的视角梳理出关键发展需求,其中高等教育学生流动问题被列为核心议题之一。

依据欧盟理事会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近期发布的《欧洲流动计划 (Europe on the Move) 》建议,至少 23% 的高等教育毕业生在求学期间应具备海外学习流动经历。国际竞争力已成为职场核心技能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融入各类学位与资格认证体系之中。尽管新冠疫情后国际学生流动情况有所复苏,但长期海外交换项目的参与率仍持续走低,不过部分芬兰高等教育机构在这方面已取得积极进展。芬兰科学与文化部长玛丽-莱娜·塔尔维蒂耶 (Mari-Leena Talvitie) 指出,海外学习单元的完成不仅让学生接触新的社群与文化,还能培养其应对多变世界所需的各项技能,包括勇气、语言能力以及在多元环境中开展工作的能力,而这些技能在职业生涯中同样具有重要价值。

工作组在与高等教育机构共同明确挑战与解决方案后,制定了八项具体建议,为提升学生国际竞争力与流动能力构建了全面框架。这些建议首先强调设定增长目标,要求在国家和机构层面均制定明确的学生流动提升目标,同时可按教育领域细分目标并配套相应行动方案。在监测机制方面,需将流动率发展情况纳入高等教育机构绩效协议的监测范畴,与协议中“考虑不同学生群体特征,促进学生和学徒多元流动”的既有目标相结合进行统筹考量。

为确保建议落地,各项举措的推进需得到多方面支持。在认知普及层面,要让各高等教育机构和不同教育领域充分了解提升流动能力的各类途径,选择最适宜的方式并保障必要的资源配置;在机构承诺层面,既要求高等教育机构管理层投身国际竞争力与流动能力提升工作,也需要各教育领域及学术人员积极参与国际化推进,将其融入课程结构与内容设计,并确保学习成果的无缝互认,同时针对各机构和教育领域的特定需求提升教职人员的国际竞争力,从学生入学之初便提供系统性指导与鼓励。在社会传播层面,需持续向社会和职场传递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价值。

在实操保障方面,建议提出开发适用于伊拉斯谟+计划 (Erasmus+) 及其他资助项目的通用数字解决方案,提升其易用性和功能性;通过伊拉斯谟+计划、其他交换项目以及高等教育机构自有资金等多渠道保障学生流动所需资金。此外,还需加强对短期和/或混合式流动在提升国际竞争力方面的成效与价值的宣传和认知。

为推动这些目标实现,配套的行动方案已明确高等教育机构与国家相关主体的责任划分。芬兰国家教育署将通过进一步强化国际学生流动的公共知识库,为高等教育机构的国际化举

措提供支持。整套建议体系围绕目标设定、过程监测、多主体协同、资源保障等关键环节，构建了全方位的学生国际流动促进机制，旨在系统性提升芬兰高等教育学生的国际竞争力，助力其更好地适应全球化背景下的职场需求与国际环境。

（来源：芬兰国家教育署（Finnish National Agency for Education）官网）

国际动态 | 美国公众对高等教育的信任度持续下滑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于2025年10月发布的一项最新民意调查，美国公众对其高等教育体系的信心在过去五年间出现了显著下降。这项在9月22日至28日期间对3445名美国成年人进行的调查显示，高达七成的美国人认为高等教育体系“总体而言”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这一比例较2020年的56%有了大幅攀升。这一普遍的负面看法跨越了所有主要人口群体，反映出公众对高等教育的担忧已超越传统政治分野。

调查深入揭示了信任危机的多重驱动因素。经济负担是首要关切：绝大多数受访者（79%）认为高校在保持学费可负担性方面做得“一般”或“很差”，这是评价量表上的最低两个等级。与此相关的，是对教育实际价值的质疑。超过半数（55%）的受访者给予“一般”或“很差”的评价，认为高校在为学生准备高薪工作方面表现不佳；近半数（49%）对高校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能力的效果评价不高；另有45%的受访者认为高校在让学生接触广泛观点和立场方面做得不足。这些数据共同指向了公众对高等教育投入产出比及其核心教育功能的深刻忧虑。值得注意的是，高校在推动研究与创新方面获得了相对积极的评价，55%的美国人给出了“优秀”、“很好”或“好”的肯定。

这种日益增长的负面情绪已经产生了实际后果，直接体现在大学入学率的下降上，许多美国人因高昂学费、沉重的学生贷款债务以及对大学教学内容的不满而选择放弃高等教育。与此同时，高等教育已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特朗普政府将那些被视为其政治议程对立面的大学作为目标，采取了包括大幅削减被指控存在反犹太主义和自由主义偏见的机构的联邦资金等措施。政府近期还邀请九所顶尖大学签署一项意识形态“契约”，以提供有利的资金获取渠道来换取在招生、女子体育和言论自由等一系列领域的承诺。

政治立场的分歧在调查数据中十分明显。虽然绝大多数共和党及倾向共和党的独立人士（77%）认为高等教育走在错误道路上，但持相同看法的民主党及倾向民主党人士也达到了可观的比例（65%）。自2020年以来，双方持此观点的人群比例均上升了至少十个百分点。

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教育学院教授阿里亚·拉兹法尔（Aria Razria Razfar）对此评论指出，尽管两党在此问题上共识度很高，但 12 个百分点的差距可能归因于高等教育界内部倾向于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意识形态趋势，以及多数拥有大学学历者更倾向于认同民主党的事实。他强调，调查证实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超越了政治归属，亟需根据人类不断变化的需求进行审视，呼吁应基于证据、价值和真理来探讨问题，而非短期的政治权宜之计。

然而，在一片批评声中，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教育学教授肖恩·里尔登（Sean Reardon）则强调了大学学历持续存在的实际价值。他援引证据表明，“大学的重要性依然很高”，当今大学毕业生的平均收入比仅拥有高中学历的成年人高出 75%，并且大学的重要性远高于 20 世纪 60 年代至 90 年代。

当前美国高等教育正面临一场深刻的信任危机，它由不断上涨的成本、对教育成效的质疑、尖锐的政治冲突以及对核心价值认知的差异共同交织而成。这场危机不仅反映了公众情绪的转变，更对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方向、其社会中的角色定位以及如何应对内部和外部的多重压力提出了严峻的拷问。

（来源：新闻周刊（Newsweek）官网）

国际动态 | 美国发布大学生健康心智研究全国报告 17%的大学生经历“严重抑郁症”

近日，美国健康心智联盟（The Healthy Minds Network）发布 2024–2025 年大学生健康心智研究（Healthy Minds Study, HMS）全国报告，该项基于大规模调查的研究，全面描绘了美国高校学生在心理健康及其关联议题上的现状图景。

研究通过严格的网络问卷调查方法，在 2024–2025 学年期间从 135 所高校收集了 84,735 名学生的有效数据。样本特征显示，参与学生在居住安排上分布多元：29%居住于校园宿舍，33%居于校外非大学住房，28%居住在父母或监护人家中。年龄构成以 18 至 22 岁为主，累计占比达 70%。性别分布为女性占 53%，男性占 41%，跨性别及非二元性别者占 4%。种族/民族构成中，白人（White or Caucasian）占 59%，西班牙裔/拉丁裔（Hispanic/Latino）为 22%，亚裔/亚裔美国人（Asian/Asian American）为 15%，非洲裔/黑人（African American/Black）

为 12%。在教育背景方面, 57%的学生攻读学士学位, 31%为混合授课模式, 而心理健康服务需求与学术障碍之间存在显著关联。

在心理健康问题流行率方面, 抑郁筛查采用患者健康问卷-9 (PHQ-9), 结果显示 37% 的学生存在抑郁症状, 其中重度抑郁占 17%, 中度抑郁占 19%。焦虑筛查使用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7 (GAD-7), 任何焦虑症状的检出率为 33%, 包括重度焦虑 14%和中度焦虑 18%。孤独感体验方面, 约 40%的学生时常感到缺乏陪伴或被孤立, 24%的学生表示经常感到孤独。自杀相关行为数据显示, 过去一年内有 11%的学生产生自杀意念, 5%制定自杀计划, 2%有过自杀尝试, 而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发生率达 27%。学业受损方面, 67%的学生报告在过去四周内因情绪或心理困难影响学业表现, 其中 16%的学生受影响天数超过六天。

健康行为与生活方式分析表明, 药物使用类型多样; 在饮酒行为上, 60%的学生过去两周未饮酒, 而 10%的学生报告至少一次暴饮。运动习惯上, 25%的学生每周运动不足一小时, 仅有 13%达到五小时以上。

关于对心理健康服务的态度与信念, 研究发现学生对校园资源的认知存在提升空间: 仅 27%强烈同意知晓求助途径, 而有 82%的学生不同程度地认同当前需要心理帮助。校园气候方面, 高达 88%的学生认为其所在学校积极致力于反种族主义工作。

服务利用情况揭示, 精神类药物使用在过去一年中涉及一定比例学生, 尤其在抑郁或焦虑筛查呈阳性的群体中更为显著。心理咨询/治疗的使用率在不同时间段和不同群体中呈现差异, 过去一年内接受过专业咨询的学生比例, 在所有学生中为某一数值, 而在有症状学生中则有所上升。终身咨询使用率更高, 显示出随着时间推移服务接触的增加。非正式求助渠道也被广泛应用。然而, 寻求帮助的障碍因素多样, 包括可用性、成本、时间等实际限制, 以及污名化、对治疗效果信心不足等认知与社会因素。

美国健康心智联盟是美国顶尖的青少年及青年心理健康研究机构之一。该联盟致力于通过创新的多学科研究, 提升年轻群体的心理与情感健康水平。其核心研究团队遍布全美各地, 主要成员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密歇根大学、韦恩州立大学及波士顿大学。该联盟开展的健康心智研究已有十五年历史。

(来源: 美国健康心智联盟 (The Healthy Minds Network) 官网)

院校动态 | 第四届清华高等教育论坛举行

10月18日，以“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未来：市场、地缘政治和认识论正义”为主题的第四届清华高等教育论坛在清华大学东南亚中心开幕。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过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原副总干事格塔丘·恩吉达（Getachew Engida）、乌达亚纳大学学术事务副校长伊尔·伊·内加·苏贾亚（Ir. I Nengah Sujaya）、清华大学东南亚中心联席主席林美金（Cherie Nursalim）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印度尼西亚高等教育、科学和技术部副部长蒋黛兰（Stella Christie）发表视频致辞。全球教育机构的150余位专家学者和研究人员参加论坛。

过勇表示，面对全球化与地缘政治交织的复杂形势，高等教育国际化亟需构建新模式、新形态与新共识。清华大学高度重视全球战略的实施，积极推进海外基地发展建设，拓展优质国际办学资源，构建教育科研全球伙伴体系。

格塔丘·恩吉达（Getachew Engida）表示，高等教育国际化在带来合作机遇的同时面临诸多不平等的挑战，未来必须致力于构建公平的伙伴关系。

伊尔·伊·内加·苏贾亚（Ir. I Nengah Sujaya）分享了全球南方高校的国际化实践，特别是乌达亚纳大学的相关经验。

林美金（Cherie Nursalim）以清华大学东南亚中心为案例展示了国际化新理念的实体化探索。

蒋黛兰（Stella Christie）表示，高等教育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研究型大学通过科技创新产生知识、吸引投资并建设基础设施，形成“知识—投资—基础设施”的良性循环，从而促进长期经济增长。

聚焦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未来，香港大学荣休教授程介明、哈佛中国基金会主席柯伟林（William Kirby）、牛津大学全球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创始主任西蒙·马金森（Simon Marginson）分别作主旨报告。圆桌对话环节，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谢维和、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刘海峰、柯伟林（William Kirby）、清华大学教育学院院长石中英、香港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杨锐共议中美高等教育合作前景。

清华高等教育论坛创办于2022年，努力成为全球高等教育变革的瞭望塔和思想库。

（来源：清华大学新闻网）

院校动态 | 首届稷下教育论坛暨《山东大学教育评论》创刊号发布活动在山东大学举行

日前,首届稷下教育论坛暨《山东大学教育评论》创刊号发布活动在山东大学举行。香港大学荣休教授、原副校长程介明,山东大学常务副校长吴臻出席活动。

山东大学教育高等研究院院长、教师教育学院院长徐斌艳主持创刊号发布环节。山东大学校长助理邢占军表示,希望进一步汇聚众智,努力将其打造成为服务教育强国战略的思想策源与高端学术交流平台。《山东大学教育评论》顾问程介明强调,必须精准把握时代性与变革性特征,主动回应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的新需求。《山东大学教育评论》主编刘宝存提出,要以其为纽带,汇聚全球教育领域研究成果与实践经验,助力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山东大学出版社社长陈斌表示,将以高标准出版流程、专业化编辑团队全力打造教育领域的学术精品。

论坛围绕“教育的时代性”“智能技术重塑教育生态”等前沿议题设置4场学术报告会,并围绕“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设置圆桌对话环节。与会期间,吴臻为程介明颁发教育高等研究院、教师教育学院名誉院长聘书。

会议由山东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育高等研究院、山大出版社等联合举办。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10多所全国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山东大学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以及校内师生代表、济南部分中小学教师代表近百人参加活动。

据悉,《山东大学教育评论》将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教育强国发展战略,提供前沿思想交流、未来理论创新、改革实践探索的高质量学术平台。该刊物主要读者对象为教育科研人员、教育行政管理人员、高等教育院校师生及所有关心教育的社会人士。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院校动态 | 西北师范大学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新模式——“温暖陪伴”护航学生成长

一场办学历史之旅、一次专业学习体验、一顿亲子互动午餐、一回宿舍实地走访、一堂职业规划座谈……在西北师范大学,这“五个一体验”正悄然改变着家长与学校的关系。

近年来,该校以家校社协同育人为抓手,创新合作育人的“交流场”“学习场”和“实践场”,推动学校发挥协同育人主导作用、家长履行家庭教育主体责任、社会有效支持服务育人,促进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深度融合,助力学生全面成长成才。“我们不仅要走进学生心里,更要走进学生家里。”西北师大心理学院党委副书记蒋玲说。

搭建桥梁:从“旁观”到“参与”

每年新生报到前,西北师范大学的各学院已提前建好新生家长群。入学准备、乘车提醒、学习指南——这些过去由学生独自处理的事务,现在成了家校共育的起点。

“学生工作重在细节,共育就等于搭建了一个沟通的桥梁。”蒋玲一边整理学生成长记录册,一边规划着新学期的家校共育座谈会。

近年来,西北师范大学将家校协同育人贯穿学生成长成才各环节、全过程、各方面,从入学到毕业,家长不再只是典礼上的观众,而是教育的参与者。

线上,学校通过微信群、致家长的一封信,及时传递考试安排、假期安全事项;线下,家长论坛、校园开放日让家长深入了解学校发展与学生学习状况。而在寒暑假,学校积极组织导师、辅导员开展“家访进万家”活动,向家长介绍学生在校表现,了解家庭实际情况,宣讲就业政策,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

“家访让我明白了教育不单是学校的任务,成长也需要家庭的温暖支持。”2024级法学(1)班学生滕馨月说,“当两股力量同向而行,我们学生的内心才更踏实。”

五个一体验:建立信任的深度接触

合作共育源于家校信任,信任源于相互了解。“作为学生家长,我深感家校协同是孩子成长的重要桥梁。我们不再只是旁观者。”滕馨月的家长杨小燕感慨道。

西北师范大学不断深化“五个一体验”育人模式,通过日常生活场所与公共教育场所的深度串联,推动家校共育走向深入。

参观校园、校史馆,让家长了解学校的办学传统;体验课堂教学、专业实验、文化活动,感受校风学风;班主任陪同走访学生宿舍,一起了解住宿条件、指导生活习惯养成……

“这种深度接触,打破了学校与家庭之间的信息壁垒,建立了坚实的信任基础,同时也构建了良好的生生关系、师生关系。”蒋玲说,家长走进校园深度体验,也增强了对学校办

学治校的信心。

与此同时,学校将家校协同开展职业规划指导贯穿教育全周期,积极引导家长转变观念,科学看待考研,提供供需适配的就业建议。学生毕业后,学校坚持“离校不离心、服务不断线”。

整合资源:构建育人共同体

西北师范大学的探索不止于校园围墙之内。学校积极整合校内外资源,围绕学生学习生活的时间轴和空间场,凝聚家校社育人合力。同时,依托教师教育科学研究、学科特色、师资优势,成立“西北师范大学家长学校”,构建家长学校课程体系、指导家庭提升教育能力,让家校共育从情感共鸣走向专业协同。

“家校共育模式显著提升了辅导员育人工作的精准性与实效性。”党委学生工作部干部任思泉表示,“它延伸了教育时空边界,形成了家校协同合力。”

学校还优化家校社医协作,与社区心理咨询机构、医疗机构建立协同机制,定期邀请社会心理专家进校园,为学生提供专业心理咨询。同时,畅通预防转介干预通道,为需要帮助的学生及时提供专业治疗。

此外,学校充分利用甘肃省独特的文化资源优势,依托革命纪念馆、联合文博、科普、体艺等公共资源,建立实习实训基地、社会实践基地、创新创业基地,打造“行走的课堂”“有风景的思政课”。

学校还不断深化校地合作,建立“学校主责+教育部门主管+属地部门协调”的校园安全工作机制,将平安校园建设纳入信息化平台,构建起融合安全教育、矛盾化解、信息共享的校地合作新模式。

“家校之间曾经存在的无形界限正在消融。通过搭建交流、沟通桥梁,学校深入了解学生,精准识别需求,从而制定个性化成长方案,护航学生成长。”任思泉说。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高教研究

我国高等教育专业设置及调整历史脉络、底层逻辑与高校应对 | 施晓光

摘要:最近,有关高等教育专业设置与调整问题的讨论再次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门议题。通过梳理我国高校专业设置的发展过程,揭示影响我国高校专业设置和调整的主要动因。它们是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契合产业升级换代匹配、服务国家发展战略需求、迎接新技术发展挑战、推动高等教育自身变革。基于此,高校要充分认识到专业设置与调整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深刻领悟专业设置与调整工作的规划性和科学性、高度尊重高校在专业设置与调整中的自主性和主动性、不断强化专业设置与调整和产业结构的关联性和耦合性、重视师资队伍建设和增强专业设置与调整的可能性和保障性,从而为适应新的外部环境变化做好准备。

关键词: 高等教育; 专业设置与调整; 高等教育改革; 高质量发展

从理论上讲,“专业”(Profession 或 Major)是高等教育领域的重要概念之一,是根据学科分类和社会职业分工,系统地传授某一领域知识和技能的教育单元,是高校培养学生的重要载体和组织形态。它通常以学科为基础,以课程体系为手段,以培养目标为牵引,以学位授予为结果,是高校组织安排中不可或缺的组织部分。简而言之,专业就是课程的一种组织形式。[1]从历史上讲,我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高校专业设置与调整工作,始终使之处于动态调整过程之中。2025年,我国颁布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提出,优化高等院校学科专业调整工作的重要性,并积极部署和推动高校专业设置和调整。本文旨在通过梳理我国高等院校专业设置的发展过程,揭示其底层逻辑,为我国高校专业应对新一轮专业调整提供参考性意见。

我国高校专业设置和调整的历史回顾

与欧洲大学专业发展相比,我国专业设置的时间相对较晚,既是清末新政改革的产物,也是学习借鉴西方大学模式的结果。例如:1898年,京师大学堂建立之初就设立了哲学门、文学门、理学门等科系及其相应的专业[2]。当时,虽然它未以专业为名开展教学活动,但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对应的课程组织,具备了专业的雏形。中华民国建立后,大学开始采纳了西方的学术体制,专业制度得到一定程度发展和完善。然而,1949年前,我国高校并不设置专

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国高校专业制度建设深受苏联模式影响。现今所采用的“专业”一词也是从俄文翻译而来,并早在1952年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全国农学院院长会议的报告》中被首次使用,从此之后,“专业”或“学科专业”一词成为正式的政策话语。1954年,国家出台了《高等学校专业目录分类设置(试行草案)》,建立了我国的第一个专业目录。[2]当时,这个专业目录是以苏联模式为蓝本,强调“对口培养”,构建起覆盖工业、农业、国防的学科体系,为国家工业化输送紧缺人才。专业目录设置总的指导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3]然而,由于以苏联模式为样板形成的学科专业体系划分过细,偏向工科类和师范类专业,其弊端也日益凸显。为此,1963年,我国对高等教育目录进行了第一次修订,分别设置了普通专业目录和绝密、机密专业目录,合并了一些划分过细的专业。1966年—1976年“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高等教育发展受到巨大的冲击,专业设置随意而混乱,学科门类界限不清,这种情况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得以扭转。

改革开放后,高校学科专业设置经历了几次专业调整。第一次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1978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做好高等学校专业设置和改造工作的意见》,提出了专业改造的原则,强调了“专业设置不宜过窄,要注意变化与稳定”。1985年,随着《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教育部开展新一轮本科专业目录的修订与调整,本科专业种数从1,343种减少到了671种。1987年,国家教委组织起草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暂行规定》,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高校专业设置管理的法规,旨在加强专业设置的宏观管理。为落实文件精神,教育部仍然重视专业调整工作,努力摆脱计划经济模式影响。到1987年,高校专业总数已经被压缩为644种。第二次较大规模专业调整工作始于1993年。当时的国家教委为了落实《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的改善“专业划分过细,专业范围过窄,专业名称不尽科学,门类之间专业重复设置,本科专业门类与学位授予门类不相一致等问题”的文件精神,重新修订本科专业目录,分设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十一大门类,共504种专业。[4]1998年后,随着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扩大以及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加快,高校专业设置和调整不仅面临着遗留的问题,更面临着新的挑战。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开始启动第三次本科专业目录修订工作。2001年,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学科专业结构调整工作的若干原则意见》,其中明确提出要扩大高校学科专业设置自主权,构建适应经济社会与科技发展需要的学科专业结构调整机制等。[5]我国高校初步获得了自主设立专业的权力,经过教育部审批备案后可以

设立目录外专业。到 2007 年,我国目录外专业点数已经超过专业总数的 50%。[6]

从七十多年的发展历程看,我国高校专业设置工作始终处于动态调整过程之中。改革开放前的专业调整完全是一种政府行为,高校只是负责人才培养的执行机构。改革开放以后,政府政策依然是专业设置的直接依据。与此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高校办学自主权不断扩大,政府、市场与高校各自发挥着作用,促使专业设置布局逐渐走向合理化。

影响我国高校专业设置与调整的主要动因

任何事物都有其内在的运行规律和根本动因,即为底层逻辑。所谓底层逻辑就是隐藏在表象之下的本质,具有稳定性、普遍性和因果性。学科专业设置和调整表面上看是教育行政部门根据知识分类和产业部门劳动力需要进行的行政行为,但本质上是基于对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预测性的战略性判断和合理布局。这些判断和布局的依据也构成了底层逻辑的基本因素。

1.直接动因：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经济社会发展与专业设置和调整之间存在一种双向驱动、动态适应的耦合关系,二者相互影响、协同发展。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是专业设置与调整最直接的外部牵引;另一方面,专业设置与调整可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学科专业是高等教育体系的核心支柱,是人才培养的基础平台,学科专业的结构和质量直接影响高校立德树人的成效,直接影响高等教育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能力。[7]高校专业设置的根本目的在于为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国家拥有足够的理论科学家、产业工程师和技术工人,满足国家整体战略发展目标的需要。它们不仅需要考虑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同时更主要是为未来 10 年到 20 年国家人才储备做好充足准备。例如:现在我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养老、护理和老年医学等领域人才需求量急剧增加,如南昌大学等高校新设的老年医学与健康专业。此外,随着人们环境意识的增强和对居住环境等要求的提高,环境工程、城市设计、环境科学等专业也备受青睐,如上海交通大学新设的人居设计专业等。

2.必然选择：契合产业升级换代匹配

专业设置与调整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前置性信号”。它通过人才—技术—产业的三重耦合,决定着国家产业发展的基本走向。高校专业设置和调整的成功与失败直接关系到国家“产业转型速度”,决定人才培养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合理匹配。因此,高校专业设置和调整

必须与产业部门结构调整相适应,与产业升级换代保持一定同步和共振。近几年,伴随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换代速度加快,越来越多的岗位将被人工智能机器人所取代。其结果造成越来越多的高校专业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产业升级的需要。一些传统专业就会面临被淘汰的危险,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反应就是,曾经一些高校热门专业,出现了专业匹配度不高、毕业生供大于求等问题。因此,专业设置必须基于行业变化、市场劳动力需求做出及时调整,否则专业结构就无法和产业结构相契合。

3.根本指引:服务国家发展战略需求

专业设置与调整不仅涉及人才供给端,而且还是国家战略实施的前置变量。从表面上看,专业设置与调整是教育部的行政决策,属于教育管理范畴,但实际上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底层设计,是国家在全球科技、人才和教育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的战略选择。学科专业设置不是教育系统的“内部事务”,而是国家发展的操作系统。例如:20世纪50年代,冷战爆发,在美苏之间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美国启动多项政府资助项目,重点发展航天工程、计算机工程、运输工程、环境工程、系统工程、纳米科学等新学科,很多高校也开始设置相关学科专业。根据美国学科专业分类目录(CIP)显示,“图形通信”“数字通信”“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等是当时最热门的专业,也是美国国家战略所需专业领域。近几年,中美科技竞争愈演愈烈。为了打破美国在核心技术领域对我国的封锁,2018年,教育部推进人工智能领域一级学科建设,提前储备算法、算力和数据人才。正因为如此,我国在“深度求索”(DeepSeek)大模型领域才取得突破性进展,进而打破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人工智能语言模型和算法的垄断。有资料显示:2023年,我国高校新增专业24种,其中工科占比高达39%,如大功率半导体科学与工程、智能海洋装备、电子信息材料等。这些新专业明显是以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为核心导向的。[8]

4.积极应对:迎接新技术发展挑战

从本质上说,科学技术突破也已成为国家“创新上限”,是高校专业设置与调整的催化剂和助推器。伴随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到来,以人工智能、虚拟现实、量子计算、生物学等学科为代表的新技术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从而导致现代科学发展呈现出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趋势。这种趋势标志着现代科学研究已经从“小科学时代”进入“大科学时代”。其表现为旧的知识模式正被新知识生产模式所取代,传统的学科范式和学科边界也被不断改变。譬如:数字技术催生了“数字人文”“计算法学”“生物信息学”等交叉学科,一些高校通过

技术赋能创办的专业,如新工科、新农科、新医科、新文科,不断改造传统的专业,从而使传统文科,如法、经、管等专业也因为应用场景数字化而获得新生。显而易见,学科设置和调整与科技进步有着最为紧密的关联性。以数字化和信息化为代表的新技术正在深刻重塑学科专业体系的结构与逻辑。越来越多的旨在培养跨学科知识和技能人才的新兴专业知识成为新技术赋能之下的“新宠”。因此,高校专业设置与调整必须紧跟科技发展的动态,积极应对新技术革命的机遇和调整。

5.内在需求:推动高等教育自身变革

高等教育系统作为学科生长的母体,其制度弹性确实构成学科调整的可能性边界,其结果导致不同学科门类之间增长速度出现差异性。一是供需错配与结构性矛盾日趋严重。具体表现在部分传统专业的毕业生数量远超市场需求,大学生毕业后难以找到相关专业合适的岗位,尤其是一度热门的经济学、工商管理等传统专业的就业压力严重。据《2023 年高招调查报告》显示,在 2017 年—2022 年被撤销的专业点中,“公共事业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服装与服饰设计”“产品设计”和“信息与计算科学”五个专业是高校撤销数量最多的专业,其中有 110 所高校撤销了“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位居撤销专业之首位。[9]与此同时,伴随新兴产业的迅猛发展,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养老护理等领域的人才需求与日俱增。由于高校相关专业目录调整速度相对滞后,导致这些领域人才缺口年均超 10 万人。二是专业升级明显滞后产业升级。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对技能型、服务型劳动力需求不断上升,对常规型、生产型劳动力需求有所收缩。[10]在这种情况下,原来专业名称过细、专业口径狭窄滞后于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问题日渐突出,传统专业目录已经无法满足新型产业发展需要及其对新质生产力的要求。如果这些专业不主动变革,加速升级革新,那么高等教育自身发展必然受其滞后性的影响和制约。

对高校做好专业设置与调整工作的几点建议

当前,学科专业调整布局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高等教育改革与学科专业演化构成共轭系统。二者如同 DNA 双螺旋结构,在张力中实现共同进化。因此,高校能否在专业设置与调整中发挥主导作用至关重要。

第一,充分认识到专业设置与调整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我国自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实施专业教育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的四十多年里,专业调整工作始终处于动态发展过程之中。至 2012 年之前,专业目录的调整周期大约为每十年一次。从 2021 年起,高校专业调整

更加频繁,进入每一年更新一次的状态。[11]2023年2月,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的《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明确提出“健全学科专业调整与人才需求联动机制”,计划到2025年,优化调整高校20%左右的学科专业布点,新设一批适应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学科专业,淘汰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学科专业。[12]教育部还专门制定了急需学科专业引导发展清单,引导高校专业设置与调整的努力方向。由此可见,高校专业设置与调整工作势在必行,时间紧、任务重。

第二,深刻领悟专业设置与调整工作的规划性和科学性。科学规划、有效落实是专业设置与调整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是高校自身改革与发展的优先选项。高校专业设置与调整需要按照教育政策文件和实施方案的具体要求,做好自身发展规划。在制定规划过程中,高校要处理好学校发展与专业建设的关系,明确专业建设在学校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一是要将专业建设放置在学校整体发展建设的长期规划中加以考虑。尤其是将专业建设与学科建设一并考虑,对两者互动关系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必须懂得学科建设是龙头,是专业建设的基础;没有一流的学科,也不会产生一流的专业。二是专业建设要符合学校办学定位,切忌不顾自身条件和服务对象,盲目增设新专业。例如:研究型高校应该以“科教融汇”为核心,建设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基地和未来技术学院;应用型高校应该以“产教融合”为主线,建设现代产业学院和特色示范性专业学院;行业特色高校应该依托原有学科优势,打造“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交叉复合专业方向,形成不可替代的“小赛道、大纵深”办学特色。三是重新明确学校人才培养目标,锚定服务对象和劳动力市场,充分考虑毕业生就业率指标,对就业率较低的专业必须谨慎设置。四是要不断巩固校企合作,维护传统伙伴关系。在没有找到新的合作企业伙伴之前,切忌放弃传统的服务领域。

第三,高度尊重高校在专业设置与调整中的自主性和主动性。《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赋予了高校责任和权利。高校作为专业设置与调整的主体,需要吸纳来自市场的信息,根据市场经济的需要设置、调整专业,并根据毕业生在人才市场上的就业率高低做出相关反应,促进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接轨;同时,也需要遵循教育的内部规律,在结合高校办学实际的基础上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当高校具备自主设置专业的权限、动态评价机制以及资源重组能力时,学科调整就完全有可能超越政府行政指令的被动响应,转化为基于学术生态的自组织行为。伴随高校在专业设置上的自主权不断扩大,它们对学科专业设置和调整主要通过增设新专业以及专业建设和专业内涵的调整实现。高校在考虑专业设置与调整时,必须做好市场调研和科学论证,既不能随意裁撤旧专业,也不要盲目增设新

专业。在办学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不能一味跟风,也不要“新瓶装旧酒”,自欺欺人。

第四,不断强化专业设置与调整和产业结构的关联性和耦合性。专业建设的最高标准是打造在劳动力市场具有影响力的品牌专业,形成自身的专业特色。一是要遵循巩固特色专业、优化调整关联专业、辐射带动新兴专业的路径原则,注重整合原有专业为先、开设新专业次之,做到专业动态取舍,尤其考虑专业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契合度。在这个过程中,高校尤其是对于一些处于转型阶段的学校,在新专业没有建立和成熟起来之前,不应轻易放弃传统的优势专业。二是要将学科发展置于“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大背景中,围绕本地产业链发展,坚持问题导向,理论联系实际,突出自身办学特色优势,打造一批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技术创新、社会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特色优势专业。三是坚持以特色专业为核心,辐射带动关联专业,形成特色优势专业集群。四是深化管理体制,加速组织机构再造。支持创建实体化交叉学院,如区域研究院、人工智能学院、未来技术学院等。在新型学院建设过程中,注重打破学科专业壁垒,以培育符合新质生产力所需人才为目标,构建跨学科课程体系,设置跨学科专业。通过“按行业大类招生”,培养复合型跨学科专业人才。

第五,重视师资队伍建设,增强专业设置与调整的可能性和保障性。学科专业建设的关键是人才队伍建设,尤其是专业负责人的培养与引进是专业设置与调整能够取得成功的根本保障。因此,人才竞争是学科竞争中最为激烈的领域。各种“挖人”现象、“孔雀南飞”问题造成一些西部和落后地区高校学科生态受到严重破坏。因此,所有高校都应该将人才队伍建设和稳定作为专业发展的重中之重。一是专业建设要挖掘学校现有潜力,重视本校人才,尤其要重视对青年教师和学者的培养和使用;要从物质、精神等多个方面关怀和照顾本校人才,解决其生活和工作上的后顾之忧,做到“感情留人”“事业留人”,避免“招来女婿,气跑儿子”的现象发生。二是对于自身无法产生专业负责人的学校,可以采取人才引进策略。在人才引进过程中,要为其职业发展创造条件。与此同时,人才引进要坚持“需要为本”的原则,不能单纯“为引进而引进”。对一些专业建设非急需的教师或学者,即使他们的“帽子”很大,海内外很有名气,学校都必须认真考虑、谨慎引进,不能让本校干部和教师感觉学校引进的专业负责人或学术带头人徒有其名、名不副实。

参考文献

[1]卢晓东,陈孝戴.高等学校“专业”内涵研究[J].教育研究,2002,23(7):47-52.

[2]金以林.近代中国大学研究:1895~194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23.

[3]张瑞,朱姗姗,李康伟.我国普通高校本科专业设置的特征分析与思考:基于2012—2023年普通高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的描述性分析[J].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4,46(6):74—83.

[4]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的通知[EB/OL].(2012-09-18)[2025-09-25].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moe_1034/s3882/201209/t20120918_143152.html.

[5]郭雷振.我国高校本科专业目录修订的演变:兼论目录对高校专业设置数量的调节[J].现代教育科学,2013(3):44—49,54.

[6]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大全:2003年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553.

[7]刘小强,王锋.关于60年来我国专业制度的反思[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0(1):53—59.

[8]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印发《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的通知[EB/OL].(2023-03-02)[2025-09-12].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02304/t20230404_1054230.html.

[9]袁雯,胡仲勋,包志梅.国家战略牵引是高校学科专业设置调整的基本策略[J].上海教育,2025(15):8—9.

[10]孟丽菊,徐胜男.省属高校专业设置的“合法性”依据及其调整策略研究:以辽宁省62所本科高校为例[J].航海教育研究,2024,41(3):8—17.

[11]王永钦,董雯.中国劳动力市场结构变迁——基于任务偏向型技术进步的视角[J].中国社会科学,2023(11):45—64,205.

[12]邬大光.专业的“命运”[J].高等理科教育,2024(3):3.

(来源:《北京教育》(高教)2025年第10期)

高等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加快地方高水平大学发展的战略价值、现实挑战与实践对策 | 蔡荣根 伍宸

AI 导读：本文探讨了高等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地方高水平大学的发展问题。地方高水平大学具有重要战略价值，在高等教育分类发展上，应探索与头部研究型大学差异化的办学模式，为分类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经验；在优化高等教育区域布局上，其区域分布广，能促进优质资源均衡分布，推动区域发展；在统筹中央和地方所属高校上，可探索与中央高校良性竞争、差异化发展的格局。然而，地方高水平大学也面临现实挑战，包括政府需求与办学能力、社会期待与办学美誉度、学校理想与资源平台不足之间的矛盾。为此，提出实践对策：政府应出台针对性支持计划，明确地方高水平大学发展定位，赋予其更多自主权，为其开辟专属赛道；办学主体应转变思路，明确办学定位，调整学科布局，增强内部治理能力和战略谋划能力，以提升办学水平和影响力。

内容由 AI 智能生成

一、地方高水平大学在高等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的战略价值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以下简称《纲要》）吹响了加快推进教育强国的号角。高等教育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的龙头，需要在教育强国建设新征程中发挥更重要的战略性作用。据此，《纲要》也对高等教育未来的发展做了统筹安排，提出“增强高等教育综合实力，打造战略引领力量”的整体性要求。与此同时，《纲要》还提出“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和“优化高等教育布局”的具体要求，并明确指出要“根据不同类型高校功能定位、实际贡献、特色优势，建立资源配置激励机制，引导高校在不同领域不同赛道发挥优势、办出特色”“统筹中央部门所属高校和地方高校发展”。在此宏观战略背景下，地方高水平大学作为践行分类发展和优化高等教育布局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更加充分地发挥其特定的战略价值。

（一）地方高水平大学在高等教育分类发展上具有独特价值

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始终无法形成多样化、特色化和分类发展的局面，无法走出“千校一面”的怪圈。这不仅制约了我国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还使不同层次类型的高校因同质化发展而导致恶性竞争。

我国高等教育的同质化发展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背景,有其内在的发生机制。比如,系统层面:高等教育层次化、等级化所导致的身份差异;院校层面:高等教育政策、文化环境下的理性行为;政府力量:“政策强制+项目诱致”所营造的推拉效应;国际影响:大学排名下发达国家大学模式的外溢。[1]因此,在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新征途上,作为在地方高校中发展基础较好、办学能力较强、办学内涵和目标较为清晰的地方高水平大学自然需要在高等教育分类发展上贡献其独特战略价值。具体来说,需要在高等教育分类发展上进一步探索与头部研究型大学差异化发展的办学模式。

近年来,部分地方高水平大学因为其办学优势和特色得以进入“双一流”建设序列,一方面这对于这些高校的发展无疑具有重大的托举价值,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了高校盲目照搬照抄头部研究型大学办学模式的问题。但从客观事实上看,我国除了少数大学具有建成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基础和实力外,大多数高校,包括地方高水平大学依然需要以更务实的态度走出符合自身办学定位的道路。

因此,在高等教育分类发展的大背景下,地方高水平大学理应积极探索出与头部研究型大学差异化发展的办学模式,如在人才培养的规格、科学研究的基本内涵,以及服务区域的模式等方面做出积极探索。地方高水平大学需要探索出符合自身特点的独有的高等教育办学范式,既区别于头部研究型大学,也区别于普通应用型本科院校,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方面做到既“顶天”,还“立地”。同时,地方高水平大学还要基于自身的改革发展成功经验为高等教育分类发展提供理论依据,积累实践经验。

(二) 地方高水平大学在优化高等教育区域布局上具有独特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要“优化高等教育布局”。[2]其中,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区域布局是优化高等教育布局的重要内容之一。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区域分布不均衡同样是我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另外一个重要制约性因素。长期以来,由于受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高等教育管理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以不同时期重点建设高校为代表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区域分布呈现较大的不均衡性。这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江苏、湖北、陕西和四川等地,而东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诸如浙江、福建和广东以及经济欠发达的河南、云南、贵州、河北、江西和广西等地则相对匮乏。但高等教育强国的建成需要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在更广的范围内优化布局,如经济发达的省市、人口密集的省市以及事关国家安全的民族和边疆地区等,这些区域都迫切需要加强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供给。进

入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新阶段,一些发展基础好、发展势头猛和对国家战略发展有一定支撑的地方高水平大学,成为我国做大做强优势高等教育的新生力量。由于地方高水平大学具有区域分布广的特点,因此它们的快速发展和崛起对于优化高等教育区域布局具有独特的战略价值。在优化高等教育区域布局的战略任务下,更加需要重视对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地方高水平大学的发展,它们既具有优化高等教育区域布局的战略价值,同时也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有独特意义。

(三) 地方高水平大学在统筹中央和地方所属高校上具有独特价值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中央部门所属和地方所属的高等教育二元治理模式导致了高等教育发展呈现中央部门所属高质量与地方所属低质量的二元发展格局。因此也致使我国大众对高等教育形成了“中央高校等于高水平高校”,而“地方高校等于低水平高校”的认知误区。在办学实践中,一些地方所属高校为了提升办学声誉和影响力,也出现了盲目模仿中央部门所属高校办学模式的行为,并进一步导致了办学同质化问题。所以,在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大背景下,统筹中央部门所属高校与地方所属高校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其中,地方高水平大学自然应该承担起更为艰巨的任务并贡献自身独特的价值。比如,地方高水平大学需要积极探索既与中央部门所属高校良性有序竞争又差异化发展的战略思路,需要积极探索在同区域内如何与中央部门所属高校建立起层次分明又分工协作的差序发展格局,还需要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基本功能上积极探索与中央部门所属高校在内涵和外延上的异质化发展之路。

二、地方高水平大学在高等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的现实挑战

地方高水平大学由于长期以来得不到与中央部门所属高校同等的宏观政策支持,在发展水平和办学能力等方面与之还相差甚远。在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新阶段,地方高水平大学的发展依然面临着严峻的现实挑战,对这些挑战的清醒认识有利于我们在办学实践中做到脚踏实地,有的放矢。比如,国家层面缺少对地方高水平大学的“荣誉性”肯定和“物质性”支持,地方政府存在对“建设性”政策的“结果性”误读和“身份性”误用,地方高水平大学仍有“求大求全”的外在制度诱导和内在组织差距。[3]本文进一步从政府、社会和学校自身三个维度剖析当前地方高水平大学面临的现实挑战和固有矛盾。

(一) 政府日益迫切的需求与办学能力不强之间的矛盾

2024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教育、

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高校作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主阵地,需要发挥更大的作用。近年来,地方政府面临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艰巨任务,对高校尤其是地方高水平大学提出了更为迫切的需求。地方政府需要地方高水平大学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更多留得下和用得上的各级各类拔尖创新人才;需要地方高水平大学成为区域创新驱动发展的动力引擎,通过开展高质量的科学研究解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需要地方高水平大学扎根区域办大学,与区域形成发展的命运共同体。但在办学实践中发现,地方高水平大学与地方政府的需求之间依然存在较大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其所培养的人才还不能较好扎根区域并成为区域发展的主力军,所做科学研究成果还不能较好转化成区域所需的新质生产力,所能提供的服务还不能满足区域社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和新局面等。这也导致不少地方政府不得不“舍近求远”,纷纷寻求外地头部研究型高水平大学的帮助。

（二）社会对美好教育的期待与办学美誉度不高之间的矛盾

地方高水平大学虽然在地方高校中办学水平较高、发展态势较好,但与老牌头部研究型大学相比,还未在社会中形成广泛的影响力和办学美誉度,甚至与近年来崛起的一些新型研究型大学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一所大学广泛美誉度的形成需要时间的积累,当然也需要脚踏实地,以提高办学质量为前提。站在社会和考生立场看,他们是否愿意选择一所大学就读,除了看其是否能满足自身的专业需求外,更重要的还是看这所大学是否培养了一批能够为国家和社会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人才,并通过这些人才在社会上形成了广泛的影响力和美誉度。社会日益旺盛的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需求与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能力不充分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主要矛盾之一。而大多数地方高水平大学依然存在办学历史短、办学基础薄弱、办学能力尚待提高等问题,还未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和美誉度。因此,社会对美好教育的期待与办学美誉度不高同样是当前广大地方高水平大学面临的现实挑战之一。

（三）学校远大理想与现实办学资源平台不足之间的矛盾

近年来,地方高水平大学加快了发展步伐,树立了远大的发展抱负和理想,甚至有的地方高水平大学已确定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远景目标。但理想与现实之间却存在较大差距。由于多方面的现实制约性因素,地方高水平大学在办学资源和平台上依然存在较大的短板。以浙江省国家重点实验室为例,截至2025年6月,浙江大学牵头或参与的国家重点实验室

达到了 20 个,其中牵头 12 个,涵盖工业控制、医学、材料、信息技术等多个领域。而其他省属高水平大学仅有少数几所学校有个位数的全国重点实验室布局。地方高水平大学的其他办学资源平台,诸如博士学位授权点、“双一流”建设学科等均与头部研究型大学有着巨大的差距。这些办学资源和平台的不足与学校远大办学理想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成为高校发展的制约性因素。

三、高等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加快地方高水平大学发展的实践对策

地方高水平大学在高等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战略价值,当然也面临严峻的现实挑战和实际困难,我们在坚定信心的同时还是要脚踏实地稳步推进地方高水平大学的建设发展。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提升办学水平和影响力。

(一) 政府出台有针对性的一揽子支持计划

在我国宏观高等教育治理模式下,政府支持对高等教育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因此,对于地方高水平大学的发展来说,同样需要在宏观政策层面得到政府的系统性支持。可以在如下几个方面做出尝试,一是中央政府进一步研究并出台高等教育分类发展中针对地方高水平大学的发展定位和宏观战略规划。进一步从政府层面明确地方高水平大学的发展目标、类型定位、办学模式、内涵要求等。二是在高能级学科和科研平台建设等方面,赋予地方高水平大学更大的自主权和话语权。长期以来,缺乏高能级学科和科研平台是制约地方高水平大学发展的重要因素,需要进一步释放更大政策红利,让具有发展动力和潜力、基础较好且学科建设成效显著的高校获得更多高能级学科和科研平台。三是给予发展基础好、建设成效显著和对国家和区域重大发展战略有支撑度的高校及相关学科进入国家级重大发展战略的机会,并为他们的发展开辟有别于头部研究型大学的赛道。

事实上,近年来包括浙江省在内的省级政府越来越重视地方高水平大学的发展。2023 年初,浙江省提出大力实施高等学校“双一流 196 工程”,为高等教育发展按下“加速键”。该工程以学科建设为核心,兼顾高校分类发展,成为浙江省打造世界一流大学、服务地方经济的重要抓手。同年 8 月,浙江省召开首次高等教育强省暨高水平大学建设工作推进会。此外,浙江省委、省政府逐校审议通过 12 所高水平大学的“一校一策”方案,为高校打通差异化、特色化发展的通道。其他省份包括广东、河南、江西等也都出台了旨在促进区域内地方高水平大学发展的战略举措。随着这些省级高水平大学发展战略举措的稳步实施,地方高水平大学的发展必将迎来全新发展格局。

（二）办学主体积极转变办学思路增强内功

外因须通过内因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地方高水平大学的发展除了得到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心和支持外,更重要的是相关办学主体要抢抓战略机遇,积极转变办学思路以不断增强内功。具体来说可以从四个方面做出努力。一是从思想意识上积极转变办学思路,找准和明确自身办学定位和发展目标。地方高水平大学需要以更务实和更谦虚的态度脚踏实地扎根区域、依靠区域和服务区域,以自身的办学水平和实质性贡献获得所在地政府的支持和相应办学资源。二是要根据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积极调整学科布局,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构建更为灵活和快速的需求导向办学响应机制,以服务求生存,以贡献求发展。三是不断增强内部治理能力,构建适合地方高水平大学办学格局和办学需要的内部治理体系,营造出更为积极健康和干事创业的风气。四是不断强化对地方高水平大学发展的战略谋划能力和理论研究能力。当前我国地方高水平大学发展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局面和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地方高水平大学的建设者和参与者要以在场的态度积极强化对自身发展战略以及面临的现实问题的系统性理论研究,以更为系统的思维方式思考和研判学校的发展问题。为此,宁波大学成立地方高水平大学发展研究院,研究院致力于成为“理论—政策—实践”三位一体的学术研究机构,在高等教育研究范式转型、服务所在机构发展等方面作出积极探索,立足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积极发挥智库功能,持续产出优质研究成果,为机构高质量发展、区域高等教育改革创新、高等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学术力量。

参考文献

[1]陈兴德.趋同存异:保持高等教育的多样性[J].高等教育研究,2022(3):43-52.

[2]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朝着建成教育强国战略目标扎实迈进[N].人民日报,2024-09-11(1).

[3]公钦正,李秀坤.“双一流”建设视角下地方高水平大学发展的困境与对策[J].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报,2023(4):70-83.

(来源:《大学与学科》2025年第3期)

教育对外开放的新使命新作为新成效 | 王定华 涂端午

摘要:教育对外开放担负着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的新使命,需着力提升

全球人才培养和集聚能力、自主创新能力、全球教育治理能力。全国教育大会后,教育对外开放通过开辟新赛道、创新新模式、布局新平台、打造新品牌,在教育强国建设中取得了积极成效,形成了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联动、官民并举的教育对外开放新格局;形成教育对外开放品牌效应,为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不断拓展开放互鉴的国际合作体系,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更多教育交流合作内涵。未来,教育对外开放需坚持好“破”“立”并重、“进”“出”有序、“内”“外”协调、“量”“质”并举、守“正”出“新”,通过加快自身格局性演变,推动中国教育在世界教育体系中形成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格局性变化。

关键词: 教育对外开放; 教育强国建设; 新使命; 新作为; 新成效

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深入推动教育对外开放,统筹‘引进来’和‘走出去’,不断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竞争力和话语权。扩大国际学术交流和教育科研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为推动全球教育事业发展贡献更多中国力量”。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1]如何深刻把握教育强国建设的“三大属性”“六大特质”“八大体系”和必须处理好的“五个重大关系”,不断提升教育对外开放水平,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外交大局,是教育对外开放必须回答好的时代之问。

教育对外开放的新使命

完善教育对外开放战略策略,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是全国教育大会和《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赋予教育对外开放的新使命。这一使命的核心是要从战略层面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通过提升教育对外开放三大关键能力,推动我国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进而为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1. 提升全球人才培养和集聚能力,助力世界重要人才培养中心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并分别从2025、2030、2035三个时间节点提出了明确的建设目标。[2]根据这一“时间表”和“路线图”,教育对外开放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提升全球人才培养和集聚能力,“将我国建成全球主要留学中心 and 世界杰出青年向往的留学目的地”[3],使我国成为世界重要人才培养中心。世界重要人才培养中心当然指向国际化教育,这是理所当然的,但这不是事物的全部。

中国有世界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做好自己的事情”，让本国教育体系完备、泛在可及，让本国民众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这是世界重要人才中心的有机构成。全国教育大会以来，教育部更加明确将终身学习和开放大学纳入教育发展日程，提供多元化的学习机会和资源，满足不同年龄段和职业背景人群的学习需求，并建设所有人都能获取的线下线上学习资源平台。

2.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助力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

教育对外开放要以开放促创新，通过积极开展国际科研合作，提升我国在关键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推动高校在原始创新和自主创新上出更多成果，助力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全国教育大会以来，各地各界更加认识到我国高等教育实力，增强了科技创新的使命感。我国高校学生规模世界第一，教育质量正在提升。2024年，我国有3119所各类高校，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逾60%，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在学规模4846万人，世界首屈一指。中国高校在国际排名中不断攀升，多所顶尖高校在QS、泰晤士高等教育等权威榜单上名列前茅，显示出强大的教育和科技实力，一些头部高校在科研、教学、国际化等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中国教育变革与发展高速推动人才资源优势转化为创新驱动优势，着力构建既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又具备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培养格局。中国高校科技创新和研究成果成绩斐然，全球贡献占比增加。中国在全球科研论文发表数量和质量上均位居前列，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5G通信等前沿领域，取得了许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突破性成果。2024年我国在全球创新指数（The Global Innovation Index）中的排名，从2013年的35位升至11位。中国科技创新的快速发展，不仅推动了国内经济社会的繁荣，也为世界科技与教育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国正携手构建高水平数字教育国际开放合作体系，携手推进数字技术赋能教育转型变革，携手促进数字教育成果普惠共享。体现3C，即联结为先（Connection）、内容为本（Content）、合作为要（Cooperation）；力争3I，即集成化（Integrated）、智能化（Intelligent）、国际化（International）。超前识变，积极应变，主动求变。认识人工智能，拥抱人工智能，驾驭人工智能，让人工智能成为教育国际交流助力形成世界重要教育中心的手段。

3.提升全球教育治理能力，助力世界重要教育治理中心建设

全国教育大会之后出台的相关政策文件，对世界重要教育中心建设提出具体要求和安排。党中央国务院颁布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提出“完善教育对外开放战略策略，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教育部发布《教育强国建设三年行动计

划综合改革试点方案》，提出构建教育国际战略合作体系，将加强国际教育交流合作与各领域深化改革有机结合，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这些政策举措是党中央相关决策部署的层层递进和在教育领域的生动实践。早在 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就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4]教育对外开放的主要任务是围绕“着力增强规则制定能力、议程设置能力、舆论宣传能力、统筹协调能力”[5]，全面提高我国在全球教育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使我国成为世界重要教育治理中心。

教育对外开放的新作为

1. 开辟教育对外开放新赛道

面对全球教育交流合作新形势和日益激烈的全球教育竞争，开辟教育对外开放新赛道是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的重要举措。一是成立全球教师发展学院。教育部依托北京师范大学成立全球教师发展学院，并在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中国教育学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等 21 家联合单位设立分院，通过加强教师国际交流合作的统筹规划，推进国际教师来华研修、国内教师海外交流、数字赋能海外教师发展、国际 STEM 教师教育、南南合作教师支援、全球教师标准参与及教师教育国际传播，形成推动全球教育治理体系变革的全球教师发展网络。二是成立全球领导力学院。教育部指导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高校成立全球领导力学院，组织开展各国青年全球胜任力培养，组织开展发展中国家行政管理人员领导力研修，介绍中国理念本质，分享中国治理实践，展示中国成功方案。三是打造系列数字教育公共产品，推动“慕课出海”。在 2024 世界慕课与在线教育大会发布《无限的可能—世界高等教育数字化发展报告（2024）》《世界高等教育数字化发展指数（2024）》，为世界各国提供科学依据和数据支撑，把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国际版推向世界，助推 100 门慕课“出海”至泰国、450 门慕课“出海”至印尼。在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排行榜上，中国从第 24 位跃升到第 9 位。四是积极创设运营教育类国际组织。教育类国际组织作为思想实验室、标准制定者、国际合作推动者、信息交流中心、能力建设者在全球教育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类中心 STEM 教育研究所落户中国上海，以及世界数字教育联盟、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数字教育联盟、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博士生培养创新中心、世界基础教育联盟（筹）等由我国发起的国际组织相继成立或启动，我国在引领相关议题设置、规则标准设置以及推动教育国际合作等方面正在塑造新优势。

2. 创新教育对外开放新模式

新的教育模式和开放形态是与传统教育强国竞争世界重要教育中心的关键。继深入推进“西湖大学”等新型研究型大学、迪拜中国学校、里约热内卢中国学校等海外学校建设，全国教育大会后，教育对外开放更加重视统筹国内国际两类教育规则，稳步拓展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积极推动生源、专业、师资、投入等要素型开放，不断创新开放模式。一是随着数字技术正以新理念、新业态、新模式引领教育形态重塑和创新发展，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积极推进云端学校、国家数字大学建设，开发跨境云端课程，探索与国外高校开展数字学历互认试点。二是在教育对外开放中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促进创新链、人才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海南教育创新岛，吸纳国内外知名大学入驻，基本形成“园区+科研+教育”模式。三是在区域开放中打造高等教育交流融合新形态。如澳门高校在横琴开设校区延伸办学；深圳大学在港设立校区，中山大学在港设立综合性研究机构，实现粤港澳高等教育资源融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乌兹别克斯坦成立塔什干分校，走出农林教育“出海”新路径。

3. 布局教育对外开放新平台

近年来，教育对外开放在关键领域不断建设新平台，依托新平台，汇聚推动变革、引领发展新动能。一是在数字教育领域，依托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深度参与并引领全球数字教育治理，推动我国从数字教育的技术应用者向规则制定者和方案提供者转变。二是在职业教育领域，2024年11月在天津举办的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吸引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余名境外嘉宾，覆盖政府官员、驻华使节、国际组织和院校代表。在促进国际产能合作、扩大教育国际影响、服务国家外交大局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三是在国际中文传播领域，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向2024年11月举办的世界中文大会致贺信中，希望各方“为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四是在国际教育发展合作领域，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北京外国语大学于2024年启动“中非高校百校合作计划”，成为中非教育合作的旗舰项目，正助力中非教育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迈进，为实现非盟《2063年议程》的教育目标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五是在基础教育领域，积极筹备举办2025世界基础教育论坛，组织实施基础教育海外高端研修项目，将教育强国的“基点”置于全球坐标，不断提升基础教育的国际影响力。

4. 打造教育对外开放新品牌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提出“实施中国教育品牌培育计划”。继鲁班工坊之后，近年涌现出“贵匠工坊”“澜湄工坊”等一批地方职业教育新品牌。除了深入推进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领域的品牌建设外，2025年教育部基础教育司通过调研，规划培育10个中小学国际交流特色品牌项目、100个中外基础教育人文交流基地、1000所中外基础教育特色学校。[6]结合国家教育数字化发展战略，推动传统教育品牌向数字化品牌转型，推进国际教育交流品牌项目数字化。通过品牌建设不仅打造了一批服务教育强国建设和国家外交大局的“国家名片”，也使全球学生、学者、智力流动的“流量”“流速”与“流向”在品牌的影响下，朝着更有利于我国建设世界重要教育中心的方向上变化。

教育对外开放的新成效

1. 形成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联动、官民并举的教育对外开放新格局

2025年，教育部在长三角、京津冀、中西部、中部、东北、粤港澳、新疆召开7场教育强国战略咨询会，聚焦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战略，创新部省会商战略合作机制，优化区域教育开放布局。如充分发挥新疆独特区位优势，聚焦打造中国教育面向“一带一路”国家开放合作桥头堡与教育对外合作战略高地；大力推进广西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加快建设面向东盟的职业教育开放合作创新高地和产教集聚示范区；发挥海南区位与教育开放优势，加快建设国际教育创新岛，打造教育国际交流合作的战略重镇。教育部牵头成立的全球教师发展学院，聚焦教师国际交流合作，引导行业企业、社会组织等第三方力量参与，以社会力量赋能教师国际交流合作，形成教师发展公益支持“蓄水池”，推动和保障教师国际交流合作向纵深发展。[7]通过巩固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先导地位，提高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开放水平，完善“政府主导、多方协同”的可持续支持体系，在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对外开放基础上，形成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联动、官民并举的教育对外开放新格局。

2. 形成教育对外开放品牌效应，为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随着各地深入开展留学品牌建设，如“留学北京”“留学海南”“留学广西”“留学江苏”，在地方留学子品牌的有力支撑下，“留学中国”的品牌效应不断叠加放大。目前，共有195个国家和地区留学生来华求学，“留学中国”的影响力和品牌度持续提升，培养了一大批高层次国际人才和知华友华国际人士。职业教育领域，我国已在亚欧非三大洲合作建成30余个鲁班工坊，学历教育累计培养学生近万人，实施职业培训超过3.1万人次。[8]基础教育领域，

“中英数学教师交流项目”已互派5批中小学教师720多人次。上海数学教师赴英开展教学交流受到了英国师生的广泛认可,并得到了英国主流媒体的关注与积极报道,是第一个我国向发达国家进行教育输出的成功范例。对于推动中国基础教育走出去、扩大上海乃至我国在全球教育格局中的影响,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3.不断拓展开放互鉴的国际合作体系,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更多教育交流合作内涵

在教育强国建设中,国际合作体系是我国教育融通世界资源、提升全球人才培养和集聚能力、自主创新能力、全球教育治理能力的“关键枢纽”。教育对外开放主动融入国家对外开放大局,服务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打造全方位多领域交流合作平台,不断拓展国际交流合作体系的内涵与外延。如今,中国已与183个建交国普遍开展教育合作与交流,与6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学历学位互认协议。[9]继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后,我国加强与中亚教育合作,通过构建人才共育的高等教育合作新体系,揭牌“丝绸之路经济带水资源高效利用与河湖健康国际联合实验室”“丝绸之路经济带作物生物育种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等,打造中国—中亚教育合作共同体。广西紧扣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深化面向东盟教育交流合作,打造东盟青年向往的留学目的地,助力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在中外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下,深入推进中外青年交流,高质量落实“5年5万名美国青年来华交流学习”“3年1万,欧洲翻番”倡议,打造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中外人文交流体系。通过不断拓展国际合作体系的内涵和外延,更好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等国家战略大局。

完善教育对外开放战略策略的建议

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宏伟目标,教育对外开放需要在坚持以下五大原则,处理好五对基本关系中持续发力,善作善成。

1. “破”“立”并重

处理好改革与开放的关系。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扩开放。把开创教育对外开放新赛道、新模式、新平台与解放思想、破除教育体制机制障碍有机结合。对教育对外开放各创新主体放权赋能,深入推进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突破制约创新人才自主培养、参与全球教育规则制定、推进国际教育发展合作和教育国际传播的结构性、制度性障碍。将一些比较优势明显或发展潜力大的项目如联合国教科文一、二类中心、“中非高校

合作计划”等列为建设世界重要教育中心重点打造的旗舰项目，重点支持，重点推进。

2. “进”“出”有序

统筹好“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关系。通过加强“留学中国”品牌和能力建设、打造高质量国际暑期学校项目、推进中外青少年交流机制化、常态化，分层次分类型分学段提升世界优秀人才培养和聚集能力。筑牢教育对外开放风险防控体系，完善覆盖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全领域的风险防控机制，推动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基础教育、数字教育协同有序“出海”。根据教育强国建设战略需求，优化调整“进”“出”的规模、层次和结构，更好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内”“外”协调

协调好教育内循环与外循环的关系。依托我国世界最大规模教育体系优势，增强国内国际教育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推进知识创新要素在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科技领军企业的开放流动，提升优质教育资源、要素在校内外、区域内外、国内外的开放水平。打通教育资源、要素在区域、全球流动中的“堵点”，推进国内教育体系与国际教育体系互联互通，实现教育体系内外循环的相互衔接转化。

4. “量”“质”并举

处理好扩增量与提质量的关系。既要在国际组织人才、区域国别研究人才、拔尖创新人才供给和国际组织关键岗位职员输送上补好量的短板，也要从教育对外开放项目整体上促进质的提升。通过推进国家、地方和学校品牌分类规划、分类培育、梯次发展，实现教育对外开放项目品牌化、国内品牌国际化、国际品牌全球化，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对外开放品牌体系，做大做强教育对外开放的薄弱领域和关键领域，更好推进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

5. 守“正”出“新”

处理好坚持本源与突破局限的关系。中国近现代史赋予了教育对外开放深厚的民族复兴情结。要守好教育对外开放的本和源、根和魂，毫不动摇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强化教育对外开放的思政引领力，确保教育对外开放正确方向。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围绕教育对外开放的内涵外延、方式方法等基本理论问题以及品牌建设、新样态和新模式打造等实践前沿领域，提炼形成扎根中国的知识体系与理论成果。以知识理论的自主创新，驱动对外开放的

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不断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夯实世界重要教育中心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创新根基。

总之,全国教育大会召开后,教育对外开放因势而动,顺势而为,主动超前布局、有力应对变局、奋力开拓新局,着力推动我国教育由大到强的系统性跃升。未来,教育对外开放通过加快自身格局性演变和体系化建设,必将推动中国教育在世界教育体系中形成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格局性变化。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2]习近平.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 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J].求是,2021(24).
 - [3]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 [4]习近平.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J].求是,2019(4).
 - [5]习近平.加强合作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共同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N].人民日报,2016-09-29(01).
 - [6]孙金鑫.高举“实干”大旗 努力办强办优基础教育——专访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荫[J].中国基础教育,2025(4).
 - [7]教师国际合作公益项目启动[EB/OL].(2025-06-12)[2025-08-26].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2506/t20250612_1193921.html.
 - [8]张赞芳,陈欣然.“中国职业教育取得的成绩令人瞩目”[N].中国教育报,2024-11-23(02).
 - [9]钟育文.教育强国成于实干[N].人民日报,2025-03-24(09).
- (来源:《中国高等教育》2025年第18期)

学分“减”了，人才培养该“加”些什么 | 王轩尧

“从 2025 级开始，我们修订了培养方案，有些本科专业的学分要求比之前最多减少了 30 个！”这个新学年，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校长郭福在开学典礼上宣布。

新学期开学，不少高校宣布缩减毕业所需的总学分，重新设置课程内容。例如，北京建筑大学划定学分红线：四年制理工类专业学分控制在 150 学分左右，管文类则在 135 学分左右，较以往平均减少了 15 到 20 个学分。复旦大学在教育教学改革 3.0 版方案中提出“双重减法”：不仅将本科项目必修学分减少 15 到 20 个，还计划将 18 个试点单位的课程总量缩减约 20%。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剔除重复课程学分，压缩 15~20 个总学分。湖州师范学院强化实践教学比重，降低学生毕业总学分……

挤压“水课”，是为了给学生留出空间发展自主学习能力。“当学分减少，多出来的时间应该用来学什么？”郭福以这个问题直指高校学分改革的方向和目标。

从传统课堂到线上教育，从固定课程到灵活学制，学分变化体现出教育理念的转型——从学校主导，到学生自我管理，从按“课表”培养到“学科混搭”，迸发创意。

当学分缩减，大学教育将“增加”什么？缩减学分的同时如何保证教学质量？针对这一现象，记者进行了采访。

大刀阔斧，多所高校精简课程计划

“以前课表排得满满当当，师兄师姐们说，他们每天都在‘赶’课。”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2025 级学生王宇告诉记者。根据学校的新版方案，他所在专业的学分较上一届总共减少了 30 分，大约相当于在本科期间减少了 8 到 10 门课，他也因此能拥有更多自己的时间。

目前，压缩总学分已成为高校学分制改革的共识，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不断“精简”本科课程计划，给学生留足自主学习时间。

这两年，海南医科大学大刀阔斧删减“水课”、压缩学时——五年制专业从 3888 总学时缩至 3342 学时，四年制专业从 3138 总学时缩至 2573 学时，平均缩减分别达 14%和 18%。在东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将总学分要求从旧版的 180~187 学分降至 161~164.5 学分，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的 10 个本科专业学分从原先 170 多分减至 150 多分。

压缩学分从哪些环节入手？东华大学教务处处长杜明介绍：“重点在于优化学科基础必

修课的设置、整合专业核心课程体系、规范实验实践环节。”

例如，东华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对学科基础课程合并、删减，同时将原来零散的实践类课程（如“市场调查”）合并，为跨学科、AI与数字创意课程预留了学分空间。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则将一些“与学科和行业发展脱节、知识陈旧的课程减掉了”。他们认为：“人工智能时代，IT技术发展非常快，传统技术很快就会被替代，因此相关滞后课程必须被替换掉。”

海南大学今年秋季学期也修订了本科培养方案。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副教授朱杰表示，该校传播学专业压缩学分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其一是缩减一些学分过高的课程，其二是优化一些重复设置的课程。

去粗取精，减学分不减教学质量

减掉了那么多学分，还能保证课程质量吗？

“减少学分并不是减少学习机会，‘0注水’‘高提纯’，让大学所学真正变为滋养未来的宝贵养分。”郭福认为，“学分的减少看似在缩小学习的‘范围’，但实际上扩大了学习的‘深度’。”

课程体系的重构往往伴随着教学模式的升级。海南大学在缩减冗余课程的同时，大力推广案例教学、项目式教学，让课堂更具吸引力。基础化学类课程主讲教授王小红表示，改革后学生的课堂参与度显著提升：“以前是我单向灌输，现在学生主动带着问题来讨论，甚至能提出超出课程范围的科研设想。”

在复旦大学，学校将教学科研岗教师每学年承担的最少课程量减至4学分，引导教师精心打造“金课”；同时，将实践教学全面融入课程教学，如上半年立项支持120多项“AI+师生共创”专项计划，同时加速AI赋能教育，叠加推进AI大课1.0版、2.0版。1.0版完成AI-BEST课程体系建设，建设课程120余门，41项“X+AI”双学士学位覆盖全部一级学科。2.0版正在围绕“以智助学、以智助教、以智促评、师生共创”，积极承担教育部智慧教育试点任务。

为满足复合型人才培养需求，减掉一部分课程后，应该“加”上哪些课程？这一减一加之间的度如何把握？

“各专业均要开设专业导论课，体现专业培养特色，避免知识‘拼盘’。”在东华大学，

杜明向记者介绍在学分削减基础上增添的课程,“原则上要求至少设置一门‘专业+AI’课程。我们已建设了 97 门‘专业+AI’课程,基本实现专业全覆盖。”

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增设了“服装工程人工智能导论”“元宇宙数字人与虚拟设计”以及“AIGC 辅助服装设计创作”等跨学科前沿与“专业+AI”融合课程。纺织学院重点扩容了智能纺织品与可穿戴技术、纺织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融合性前沿课程群,累计新增及迭代升级课程 56 门。为确保平衡,他们还建立灵活更新体系,实时跟踪行业趋势,并根据学生实际能力、培养效果和用人单位反馈来优化课程。

在文科教育中,培养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受到更多重视。“以传播学为例,在全媒体时代,我们需要增加一些增进学生全媒体综合运用能力的课程。”朱杰表示,“比如工作坊或传播学专业实践等课程,以集体协作的形式,针对某一个主题,通过查书、查论文、查资料,最终形成一个有深度的全媒体产品。这要求学生能够把学到的东西融会贯通,最终用全媒体的方式表达出来。这样才能更好适应行业发展、社会需求。”

自由选择,让学生拥抱多种可能

除了缩减学分,多所高校也在改革学业评价方式,赋予学生更大选择空间。据悉,北京大学从 2025 级起在各类学业评价中不再使用绩点,转为百分制或等级制评定。海南大学从 2024 级本科生开始全面推行五级等级制评价,将 85 分以上且排名前 30% 定为优秀,60 分以下且末位 10% 为不合格,也告别了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的绩点计算。

当学生不再需要为了提升 0.1 的绩点而选高分“水课”,就有机会拥抱更多可能。绩点改革后,海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 2024 级学生史嘉豪选修了心仪已久的计算机专业,还组队报名了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同时加入脑机接口科研团队。“终于能把时间花在真正感兴趣的事上了。”他说。

随着总学分缩减、学分制度改革,学生拥有了更多的自主学习时间。在这一背景下,学生应该如何做?

“强制性的学分少了,正好可以大胆尝试一下‘学科混搭’,基于实际问题开展项目式学习,让学科真正为我所用,‘混搭出新’。”郭福表示,“我鼓励你们探索两个或多个学科之间的‘缝隙’,去质疑‘为什么’,去问‘怎么办’,因为这些‘缝隙’往往就是创新发生的地方。”

“在总学分缩减的情况下，既要保证学生吃好‘正餐’，又要让其根据自身兴趣特长和发展规划自主‘加餐’。”杜明列举了东华大学帮助学生充分利用自主时间、探索个性成长的举措：在创新创业教育方面，依托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项目，科教融汇，开展自主性研究学习，提升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在微专业建设上，聚焦产业急需和行业发展，产教融合，实现复合交叉人才的多样化培养，为社会输送更多契合产业发展急需的拔尖人才。

“我校建设了20个微专业，覆盖了人工智能、新材料、生命健康、绿色智造、文创设计、国际传播、基础科学等类型，设置12~20个学分。其中‘人工智能’‘时尚针织数智创新’‘材料智能制造’‘空天复合结构智能设计与制造’‘集成电路’等5个微专业在2025年秋季招生，170余名学生积极修读，其他15个微专业计划2026年春季全面招生。”杜明介绍。

“我想引导学生在自主学习中做两方面的事。”朱杰表示，“第一就是读书，系统地、认真地读一本书。这不仅仅是获得知识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培养细致阅读思考的能力和习惯，这在社交媒体时代是一种稀缺的素养。第二就是有效表达，这是一种传播学专业上的实践。把自己感兴趣的话题通过当代媒体形式表达出来，这一过程中学习到的东西，能够成为学生未来工作中所需的能力和素质。”

（来源：《光明日报》2025年10月21日第14版）

人工智能 | 人工智能与大学未来 | 吉尔斯·卡登 乔什·弗里曼

阅读提示：10月16日，英国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The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Institute）发布由吉尔斯·卡登博士（Dr Giles Carden）与乔什·弗里曼（Josh Freeman）主编的《人工智能与大学未来（AI and the Future of Universities）》报告文集。文集汇聚了来自高校、产业界及政策领域的权威声音，系统探讨了人工智能对高等教育在战略规划、教学评估、科研创新及专业服务等核心领域的重塑作用。该文集不仅收录了谷歌副总裁温顿·瑟夫博士（Dr Vinton G Cerf）、南安普顿大学网络科学研究所所长温迪·霍尔女爵士教授（Professor Dame Wendy Hall FRS）、伦敦大学学院知识实验室以学习者为中心设计教授罗斯·勒金教授（Professor Rose Luckin）等九位人类学者的研究成果，还特别纳入了由OpenAI的ChatGPT企业版（ChatGPT Enterprise）根据精心设计的提示撰写的章节，邀请读者对比人机创作的优劣，引发深度思考。以下是文集要点。

这份由吉尔斯·卡登博士（Dr Giles Carden）和乔希·弗里曼（Josh Freeman）编辑的报

告文集《人工智能与大学未来》，汇集了来自大学、产业界和政策领域的顶尖专家观点，旨在探讨人工智能对高等教育领域带来的深刻变革。文集强调，人工智能革命并非遥远未来，而是“此时此地”正在发生的现实，迫切要求大学进行即时且深思熟虑的回应。

人工智能素养成为核心议题

多位作者指出，培养师生的人工智能素养是当务之急。凯特·博思威克教授（Professor Kate Borthwick）提出了六大指导原则：**知识**（理解大语言模型的工作原理）、**协作**（共同创建有效培训）、**沟通**（阐明人工智能在学习成果中的作用）、**透明度**（示范负责任地使用人工智能）、**伦理**（嵌入对社会影响的讨论）以及**持续学习**（快速适应变化）。贾尼斯·凯教授（Professor Janice Kay）和德费尔·欧文（Derfel Owen）则倡导针对教职工的“三管齐下的人工智能流畅性方法”：评估现有技能、将人工智能融入持续专业发展、并培养人工智能教学领导者。这些共识凸显了主动、有组织的技能发展对于确保大学保持相关性和有效性的重要性。

教学评估体系面临重构

生成式人工智能（GenAI）能够出色完成学生常规用于展示学习成果的作业，这对现有评估流程构成了显著挑战。罗斯·勒金教授（Professor Rose Luckin）进一步主张重新构想评估框架，应优先考察元认知、自我调节学习能力以及创造力、情感智力、批判性思维等独特人类能力。这要求高等教育将评估焦点从单纯的输出转向学习过程本身。

战略管理与行政服务的效能提升

吉尔斯·卡登博士在探讨人工智能与战略未来的章节中提出，人工智能可以“自动化和增强战略流程”，提供对外部环境的实时洞察，从而实现更复杂的场景规划和预测建模。安特·巴格肖博士（Dr Ant Bagshaw）和苏德·帕瓦纳博士（Dr Sudheer Parwana）则聚焦于专业服务领域，指出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简化行政任务（如起草报告、解读法规），带来实质性的生产力提升。尽管这可能伴随岗位减少的“阵痛”，但也为资源重新分配、创造更具影响力的新角色提供了路径。同时，必须重视数据成熟度、技术选择与经济性，并采纳伦理保障措施以防止偏见或危害。

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的协同共生

文集中一个深刻的共识是呼吁在人工智能时代重新定义和增强人类智能。勒金教授强调，

“人类需要变得明显更聪明，而不是更不聪明”，应利用人工智能来“增强——而非取代——人类智能”。人工智能应作为“心智的延伸”，扩展而非减少认知工作。高等教育的角色在于利用人工智能作为催化剂，培养批判性思维、创造力、情感智力、元认知和情境适应等独特的人类能力。最终目标是确保学生不仅仅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消费者，更是能够进行批判性评估和战略性协作的智能系统掌控者。

行动号召与前瞻视野

该文集不仅是关于人工智能的论述，更是一种行动呼吁。它将人工智能革命视为从根本上重新思考高等教育目标与实践的契机，鼓励机构以远见和目标驾驭这一变革时代。值得注意的是，文集的最后一章关于大学研究未来的文章是由 ChatGPT 企业版根据精心设计的提示生成的，编者鼓励读者将其与人类撰写的文章进行比较，以形成自己的判断。

面对汹涌而来的人工智能浪潮，大学必须积极拥抱变革，将挑战转化为重塑教育模式、提升运营效率、并培养具备未来竞争力毕业生的历史性机遇。关键在于构建负责任的、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应用生态，使人工智能服务于提升而非削弱人类对知识和智慧的追求。

（来源：英国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The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Institute）官网）

人工智能 | 人工智能人才培养须适应发展“快节奏” | 赵婷婷 燕淑娟

在人工智能专业扩招的热潮之下，如何提升这一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加强专业的内涵建设，是高校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近日，光明日报《教育周刊》连续刊登人工智能专业人才培养相关文章，引发笔者共鸣。

顺应产业发展和时代变革的必然选择

当前，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引领未来的战略性技术，更是国际竞争的新焦点。在这种背景下，加强人工智能人才自主培养，无疑是推动人工智能及其产业发展的关键之举。

我国自2017年起就积极布局人工智能人才培养。2017年教育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设立人工智能专业，推动人工智能领域一级学科建设”。2018年，教育部《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进一步要求“完善学科布局”“加强专业建设”，推进人

工智能领域一级学科建设并发展交叉学科；当年，首批人工智能专业成立。截至 2024 年，已有 622 所高校通过了教育部人工智能本科专业的备案和审批。

从产业发展来看，2024 年 9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显示，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已接近 6000 亿元人民币。行业的迅猛发展使得人工智能人才需求与日俱增。北京一家教育创新研究院近日发布的《2024 中国人工智能人才发展报告》指出，随着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AI 人才供需比从 2022 年的 0.63 降至 2023 年的 0.39，人才供不应求的程度加剧。因此，高校加大这类人才培养力度，是顺应产业发展和时代变革的必然选择。

人工智能专业人才培养面临多重挑战

人工智能专业扩招虽是大势所趋，但是培养怎样的人、如何培养人却是热潮之下更应审慎思考的问题。

第一，行业发展“快”节奏与高校育人“慢”特质存在冲突。人工智能行业技术迭代速度快，从 2022 年 11 月 ChatGPT 问世到 2025 年 1 月 DeepSeek 发布，语言大模型的算法已出现阶跃式提升。同时，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场景拓展迅速，从工业控制系统、人形机器人到智能驾驶、智慧医疗，应用场景不断丰富发展。但高校的人才培养天然具有“慢”特质，作为一项系统工程，人才培养需要在培养目标设置、课程体系设计、师资队伍建设、硬件环境配备等多方面提前做好规划。这就使得高校人才培养方案难以根据行业动态及时调整，尤其是“快”节奏行业，可能学生还没有毕业、所学知识就已过时。

第二，行业发展高要求与培养条件不到位之间存在供需错位。香港中文大学发布的《2024 中国人工智能岗位研究报告》显示，人工智能岗位对专业知识、技术技能和工程实践三大硬技能，以及项目实践经验、沟通能力等软技能均要求较高。这些能力的培养需要有丰富行业经验的教师、先进的设备和资源以及产教融合的专业实践平台来支撑。但是对于大多数高校，尤其是一些地方高校来说，现有的培养条件无法完全满足要求，这就使得所培养的学生难以形成扎实的专业能力和实践能力。

第三，专业调整与课程设置协同不够。人工智能是融合数学、统计学、神经科学等多学科的交叉领域，涵盖通用视觉、自然语言、认知推理、机器学习、多智能体等多个专业方向。因此，人工智能专业的人才培养需要重新建构知识体系。但是，当前一些高校为了搭上人才培养的“快车”，只是在原有的计算机专业、自动化控制专业等培养方案中加入少量所谓人工智能课程，缺乏对人工智能专业知识体系的系统性设计。

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实践路径

面对人工智能专业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必须积极探寻改进对策,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和水平。

第一,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建立应对产业变化的动态调整机制。高校在开设人工智能专业之前,需要对产业发展趋势进行深度调研,并结合本校办学条件合理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应系统设计专业课程体系,动态调整教学内容,及时更新教材、软硬件与数据训练集等教学资源,确保高校人才培养能够跟上市场发展和技术革新的步伐。同时,高校应认识到,技术变革的脚步永无止境,高等教育培养的学生不应只是拥有技术的人才,同时还应具备广阔视野、自主学习、自我发展等核心素养,以适应行业的快速发展变化。只有这样,才能以教育的“慢”为人才成长与发展蓄力,使其能够适应甚至引领技术进步和产业快速发展的“快”。

第二,完善校企合作机制,推动优质资源共享。对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领域的发展变化,行业企业的敏感性要远高于高校,高校应进一步完善与企业的合作机制,可在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课程开发、实习指导、毕业设计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聘请企业技术人员担任校外导师,为学生提供更多实践机会。同时,政府、高校、企业应积极携手合作,进一步扩大优质教学资源,通过汇聚国内外顶尖高校与头部企业的优质课程、项目资源,推动优质资源共享。

第三,提高专业准入门槛,加强人工智能专业人才培养的宏观调控。教育主管部门应加强对人工智能专业人才培养的管理,明确师资配置、硬件投入等方面的底线要求。对于存在“借壳招生”“课程拼凑”等问题的专业,应暂停其招生资格,并建立退出机制。目前,不同人工智能岗位的供需比差异较大,政府部门应帮助高校明确市场需求,避免专业设置“同质化”,构建差异化的“人才金字塔”。同时,高校应进一步改革对学生评价的方式,关注对学生问题解决能力和实践能力的评价,打造学生个性化成长路径。

(来源:《光明日报》2025年10月21日第14版)

他山之石

欧盟推进高校分类发展的新路径及启示 | 文雯 常伶俐 杨熙

摘要: 欧洲大学联盟是欧盟推进大学分类与协同发展的新实践,具有“建构性”与“规

范性”相统一的分类机制，强调过程性追踪以纾解分类与分层张力的评价机制，以及“为了合作而分类”的价值理念。欧洲大学联盟的建立与发展对我国分类推进高校改革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国高校分类发展要进一步完善“中央主导、地方主责、高校主体”的分类工作机制；优化高校分类发展的评价机制，强调过程性追踪与监测；以服务区域发展和促进产教融合为抓手，在分类的基础上谋求合作。

关键词：高校分类发展；欧洲大学联盟；教育强国

（来源：《中国高等教育》2025 年第 17 期）

人工智能时代国外高校教师专业发展项目实施特征、挑战与启示 |

段戴平 高思琦 丁林

摘要：基于改进的高校教师专业发展项目“曼陀罗”模型，采用系统性文献综述法对近十年国外高校教师专业发展项目实施的 40 篇实证文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项目有效实施的特征包括配备专业团队、营造安全的情境氛围，促进教师持续反思、强调激发内在动机的心理授权和外部组织赋予的结构授权，项目参与者和利益相关者的正向转变等；项目内容、运行机制与实施效果等三者的循环关联是项目有效实施的关键。人工智能时代项目实施面临可持续性有待提升、AI 技术适配与融合要求高、高校教师角色重塑难度大等挑战。受此启示，我国高校应通过跨部门协作推进项目可持续发展、AI 赋能提升项目实施水平、强化项目长效评价助力项目迭代更新。

关键词：高校教师专业发展；人工智能时代；教师专业发展项目实施；系统性文献综述法

（来源：《黑龙江高教研究》2025 年第 6 期）

德国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新解——基于工业技术文化的视角 | 巫锐

摘要：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是建设教育强国的关键路径之一。德国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不仅仅停留于市场机制所发挥的作用，而是扩展至包括现代技术、产业界和企业组织在内的一整套文化系统所产生的效果，即受到德国工业技术文化的影响。在高等教育领域，这一文化具有极强的渗透性，对德国高等教育治理的目标、主体和内容均产生了显著影响。

关键词：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工业技术文化；德国

（来源：《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25 年第 1 期）

世界一流高校教育智库的组织模式、运行机制及其启示——以哈佛大学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为例 | 姜朝晖 兰思亮 李洋

摘要：高校教育智库是推动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思想库和智囊团。“扎根中国大地和借鉴国际经验”是教育强国建设需要正确处理的五大重大关系之一，学习借鉴国际高校教育智库建设的经验具有重要意义。以哈佛大学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为例，深入分析其建设经验，可为我国高校教育智库的转型与发展提供有益参照。哈佛大学教育政策研究中心历经近20年的发展，建构了稳定的组织模式，即科学划分行政管理、项目管理与技术服务的管理体系，包含高级人才、骨干人才与预备人才的多层次人才队伍，以及依托实验区、战略数据项目与教育研究合作伙伴的支撑平台。在具体运行过程中，形成了高效的运行机制，包括自主项目、合作项目与委托项目在内的重大选题机制，以“旋转门”机制为核心的人才流通机制，囊括政府拨款、民间资助与项目创收等来源的经费筹措机制，涵盖直接转化与间接转化在内的成果转化机制。基于哈佛大学教育政策研究中心的相关经验，结合我国高校教育智库存在的现实问题，我国高校教育智库应优化人才队伍结构，完善“旋转门”机制；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密切联系教育实践；优化科研经费结构，开拓资金来源渠道；拓宽对外宣传渠道，加快成果高效转化。

关键词：高校教育智库；组织模式；运行机制；哈佛大学教育政策研究中心

（来源：《重庆高教研究》2025年第4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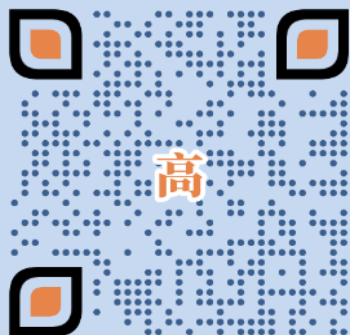
数字化转型赋能高等教育：澳大利亚迪肯大学的探索与经验 | 柴恋琪

摘要：自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以来，澳大利亚迪肯大学（Deakin University）在数字化转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成为澳大利亚以数字技术赋能高等教育的典型示范。迪肯大学数字化转型致力于培养面向未来的数字人才，提高数字教育质量，建设现代化与可持续发展的数字校园。迪肯大学通过开展数字教育、创新教学方式、打造智慧校园、深化校企合作以及夯实基础设施等路径实施数字化转型。迪肯大学数字化转型具有注重统一领导下多元利益主体协同参与，关注数字化转型的系统性、全方位与多领域，重视教育对象的全面性等基本特征。观照迪肯大学数字化转型经验，审视我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实情，我国高校要加强数字化转型的整体规划，培育复合型数字化创新人才，创新数字化教育形式，构建完备的数据治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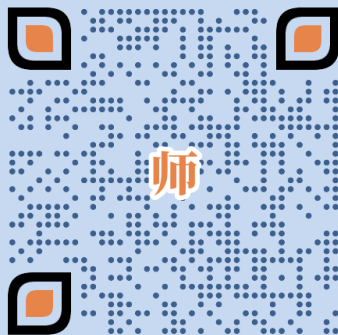
体系，推动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深入发展。

关键词：澳大利亚；迪肯大学；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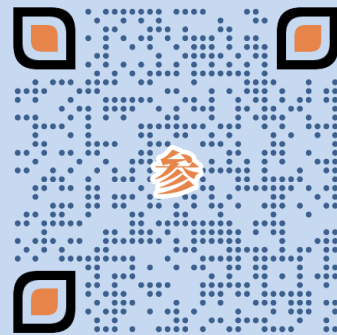
（来源：《高教探索》2025 年第 4 期）



高等教育研究所



教师教育专题信息



高教决策参考

高教决策参考
2025 年第 22 期
第 2 卷第 22 期·总第 33 期
2025 年 10 月 24 日发布

上海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200234 上海市桂林路 100 号
徐汇校区西部计算中心 2 楼
<https://ghc.shnu.edu.cn>